

风雨路漫漫
暮年忆春秋

作者·段耀亭

前言

为了纪念先祖，记载家史，怀念母亲，怀念长辈，激励子孙，近年，闲暇之际，常常思念往事，浮想联翩，难以忘怀。忆我花甲之前的人生，虽则平凡，但没有因虚度年华而羞愧；虽无伟绩，但也没有因碌碌无为而悔恨。在我人生的长河中，童年时代，充满了血和泪；少年时期，饱尝了生活、学习上的艰辛；成人之后，我把短暂而美好的军旅青春年华献给了伟大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又把坎坷、美好的终生献给了漫长而艰辛的祖国教育事业。随着社会上的风起云涌，我们的家庭也曾遭受过数年非人的磨难。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伟大转折，我们又迎来了春意盎然的美好生机。几十年来，为创家立业、养育教育子孙，我曾付出了难以估价的艰辛。在新的历史时期，儿女子孙的健康成长、事业有成和家族的融洽、兴旺和发展，使我暮年欣慰为安。为此，很想写个传记，赠给

对建国前后至今的历史，了解甚微的儿女子孙和年轻的朋友们，激发他们热爱祖国、不忘初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劳俭朴、奋发向上的情怀和事业心，以实现晚年的夙愿。同时也衷心地献给倾心爱国、志同道合的老年朋友们，勾起他们对亲身经历的沧桑岁月中，酸辣苦甜的回味，更对当今盛世美好生活的深刻体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奉献金秋。

这部传记，以社会为背景，以个人和家庭为主线，撰写了自己七十个春秋的人生经历。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已经过去的就是历史。历史是一面真实可鉴的镜子，它可以显示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本来面目和是非曲直；历史也是一部必修的教科书，它可以启示人们总结成功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指明前进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不断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创建了我国社会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辉煌的盛世，并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奋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鉴于如此，诚望有作为的儿女子孙们和年轻的朋友们，要不忘过去，不忘历史，不忘祖恩，总结经验，牢记使命，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优良传统，忠于事业，开创业绩。同时期望，在你们的晚年，也续写人生，续写坎坷的家族史、民族史，以激励后世。让我们的家族、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随着国家的富强而更加兴旺，以报祖恩，报效国家。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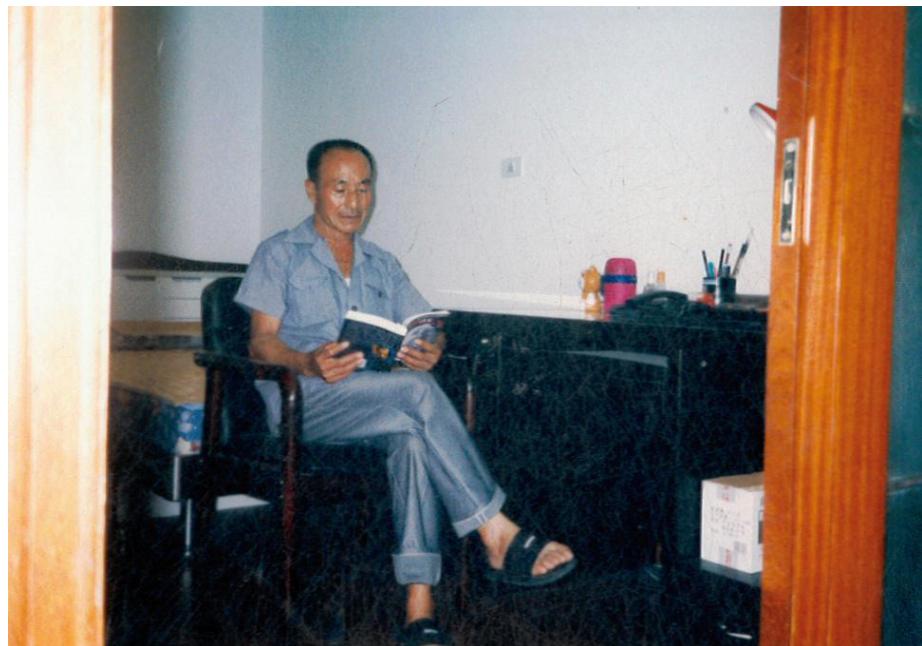
作者暮年照.....	1
作者简介.....	2
一、血泪的童年时代（1950 年前）	5
二、艰辛的少年时期（1950—1961 年）	18
(一) 启蒙教育的小学阶段（1950—1958 年）	18
(二) 奋发攻读的中学阶段（1958—1961 年）	29
三、坎坷的青年时期（1961—1968 年）	50
四、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及社会和家庭状况的变革....	
.....	80
尾声.....	144
摄影选辑.....	178
附记.....	196

风雨路漫漫 暮年忆春秋

作者暮年照



作者暮年照



作者七旬照

作者简介

段耀亭，中共党员，小教高级职称。生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家住陕西三原县新兴镇西段村。一九五一年上学，一九六零年五月加入共青团，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同年九月在新兴中心小学任教。一九六三年二月应征入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五师第二十五团。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连、营文书等职。参军五年，为我国铁路建设转战东北林海、乌蒙山区、金沙江大渡，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伟大的祖国。

一九六八年三月复员后重新在新小、西段任教。经过长期业务进修，知识水平和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一九七一年十月至一九八八年九月先后被调任新兴、柏社中学任教，曾任柏社中学教导主任、新兴中学党支部组织委员、新兴乡教育工会主席等职。一九八八年十月调任新兴乡教育组业务专干。

期间，经在三原教师进修学校进行中师函授进修结业，取得了中师文凭。一九九七年元月转任新兴乡成人教育专干，一九九九年九月退居二线，任新兴乡教育组督导员。二零零四年十月光荣退休。

退休后，作者晚年利用闲暇之际，以《风雨路漫漫·暮年忆春秋》为题，满怀深情地结合七十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撰写了自己一生经历的血泪、艰辛、坎坷、奋发努力及幸福晚年的个人传记。

这部传记是作者为后人留下的令人感慨、发人深省的墨迹，充分表达了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无比信赖和对祖国前程的美好向往。以寄托后人，继往开来，实现家族兴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花甲刚过，古稀即至。岁月如白驹过隙，
飞快如流。七十春秋忆往事，血泪、艰辛、
坎坷、奋发的人生镜头，像电影一幕幕不断
地在我的脑际闪烁掠过。

一、血泪的童年时代（1950 年前）

我从小就沒有见过父亲，也从来忌讳别人提起使我伤心的父亲。

小时候，我最早朦朦胧胧记忆中的第一个人就是慈祥的母亲。由于父亲的悲惨遭遇而过早地离去，给母亲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她经常流着泪带着病痛的身子携着我像祥林嫂那样对人们一遍遍无休止地诉说着父亲的遭遇及养育我们特别是最小的我的艰难。使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理下了伤心的血泪和悔恨。

我的祖父名叫段启文，祖母潘氏，他们仅有两子，即伯父段善荣，父亲段兴荣。小时候，我们听伯父说，我的曾祖父排行为三，亲兄弟五人，只守养了祖父段启文一个男孩。由于当时家道比较殷实，供祖父从小就读私塾。他酷爱读书，广读博学，积累了较厚的文化功底，早年就接受了清末维新思想的熏陶，年轻时于民国初年就参加了推翻清朝、

保卫中华民国新政权的辛亥革命。因而，我家当时也是一个具有革命业绩的家庭。据伯父讲，祖父离家时，他已十二、三岁，对祖父的当年从军投身革命，他仍记忆犹新。他说，祖父临行时，身背大马刀，走在村口一棵大槐树前，果断地咬破手指，毅然用带血的手指，在刮去一片树皮的树身上，写下了“男子要挂封侯印，除非回头血染刀”的豪言壮语。此后不久，当年祖父在著名的陕西辛亥革命乾县保卫战中英勇殉难，壮烈牺牲。体现了他老人家为革命英年壮志不已，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几十年来，我们孙辈们，一直缅怀着这位并不寻常而伟大的革命英烈祖父。祖父离世后，家中仅有祖母及两个年幼的儿子。当时，虽然民国政府给了我家一定的抚恤，但日子仍难以维持。直到伯父十四岁那年开始，就给人家打短工、拉长工艰难度日。伯父成家娶伯母闫氏为妻后，继续拉长工，养活祖母、父亲，置办家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父亲成人后娶母亲雷清贞为妻。光阴似箭，直到一九四四年农历七月十八日随着我的出生，全家已是

十三口人的大家庭。即伯父母及其四个女儿（伯父的大女儿，即大姐已出嫁本村年家）和父母亲、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及还是婴儿的我。父亲离世后直至解放前夕，全家仍还有十多口人。

家大业穷，加之父亲的惨遇，生活的重担压得父辈们喘不过气来。母亲也因父亲的离去整日以泪洗面，对邻居、对亲朋、对我们哭诉不止。

我小时的记忆是从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开始的。从朦胧记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着母亲的苦泪诉说。

抗战后期，国民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严密经济封锁，陕北红军处境十分艰难，我们村里人根据地下党内线人的秘密联系，也经常分批次悄悄地给淳化、耀县境内的八路军根据地送棉花。母亲说，我出生的第十天，为了生计，父亲是在当天夜晚和同村的八、九个人给淳化境内八路军根据地送棉花时，途径冯寨村被土匪劫杀的。她说，父亲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当时，母亲正处在我的月子里，父亲不听她的劝阻，悄悄走了。接着母亲可怕可悲的

事发生了。噩耗传来，全家人悲痛欲绝，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悲愤的伯父和惠家姨表弟即我的振祥伯到冯寨明察暗访，终于找到了父亲遇难之地。叫人将遗体抬回安葬。

听樊家河胞姐桂贤和二哥耀林说，父亲的遗体从淳化县方里镇冯寨村被抬回后，全家人悲痛欲绝，无不撕心裂肺地嚎啕痛哭。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做了一大轮子锅饭，都伤心的竟无一人端碗。村里不少乡邻都落下了同情的泪水，全村人在一片悲愤的气氛中，安葬了英年遇难而可怜的父亲。当时父亲年仅 32 岁，母亲 29 岁。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过了不久，我一个年仅四岁的胞姐也因病不幸夭折。母亲本来就承受不了父亲遇难的打击，这下更是雪上加霜。身心深处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她的精神接近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母亲身边的四个孩子还很小。年仅十二岁、正在惠家上小学五年级的大哥段耀森被迫失学，胞姐桂贤（宁果）十岁，二哥耀林七岁，我才十天，还是个月子里的婴儿。

对于父亲被残害一案，我们全家人一直耿耿于怀。在解放前后的十多年里，家里一直托人在冯寨村暗访。初步了解到，酿成这一惨案的凶手是一名当地教私学的先生。他为了谋财害命，借了一杆枪，利用夜间，专门拦路抢劫给淳化境内八路军根据地送物资的老百姓而酿成血案。据说，凶手解放后被政府镇压，到底如何？我们家里人疑虑重重，忧心忡忡，心里没有个底。

对于父亲惨遭劫难，小时候从我懂事的第一天起，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就埋下了伤心的血泪和悔恨。记得在我上初中期间，我曾给任村干部的大哥提说过此事，大哥说，父亲的血案，他一定要向政府投诉，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为父亲报仇雪恨。

母亲是一位深受旧社会迫害的贤惠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从小就多灾多难。雷家娘家的外祖父下四川做生意，小时家庭生活比较殷实。七岁时，家庭遭土匪打劫，后迁鲁桥。其兄被烧残后致死，嫂子改嫁，外祖父闻讯后遭病逝于四川。家中只剩母女二人，十二岁时外祖母突然病逝，她只身被屈

家表姨妈收留，十五岁时就过早出嫁。

身受封建传统礼教熏陶的母亲，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由于她幼年丧父母，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过早的懂得了人世间的是非曲直与荣辱。从而，她心底善良而性情刚毅。尽管她又受到了丧夫丧女接踵而来的打击，仍然强打精神挺起身子，辛勤劳动，操持家务，养育儿女；尽管她因受打击，拖着病体，仍然还要用仅有的一点点乳汁哺育着我；尽管她长时间的病体，已没有乳汁，仍然烧磨糊、热面汤喂我养我；尽管一些好心人劝她改嫁出走，她仍然离不开自己用心血养育的儿女。她常说：“娃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疙瘩肉，我实在离不开。”

我永远不会忘记特别关心母亲和我的两位已故几十年的老人，即屈家姨妈和惠家姨婆。我是一个从小缺奶的孩子。小时模糊的记忆中，在农闲时节，母亲带着我常被屈家伯运表哥接到姨妈家，一住下来就是十天半月，长则一月、四十。也常去惠家姨婆家（祖母妹妹，其子惠振祥）养病。我稍大

之后，她常说：“你小时无奶吃，你振祥伯常抱你到别人家里喂奶。”两位老人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母亲，精神上也给母亲极大地鼓励。



慈母七十三岁留影

残酷的现实，使母亲身心备受摧残。由于背地

里她经常以泪洗面，哭坏了眼睛，长期害眼病；繁重的体力劳动又使她得了妇科病；经常思念父亲、操心儿女，更使她患了重度的精神恐惧症。她经常在梦中魇住，大声哭喊不止，不得醒来。我们惊醒后推她、叫她，她才醒来，说：“我经常好像觉得你大没有死，梦见他回来了，坐在椅子上，把我吓得说不出话来。”或者有时把她叫醒后，她又魇住，醒后说她又做了一个噩梦。

我从小一直最怕母亲梦中魇住，经常睡觉很醒，随时注意叫醒她。可见家中的不幸，使母亲心灵深处伤痕累累，遗恨终生。直到老年，她这个梦中魇住的重度精神恐惧症仍没有好转。儿孙们也注意经常叫醒她。精神上安慰她。

父亲去世后的三年，家里不得已除请帮工外，伯父和大哥承担了家庭的生活重担和重体力劳动，伯母、母亲及几位较大的姐姐是家庭农活的辅助劳力。直到四七年以后，大哥长大了，也不用雇人了。平时，家里的纺、织、染、做衣服及主要家务活也全靠母亲和伯母。解放前后的几年里，本村大姐夫

文彦哥经常帮家里干一些重体力活。农忙时全家人都上地。农闲时，男耕女织，完全处于一种既不能自给，又不能自足的极其落后的小农经济状态。当时解放前夕的苛捐杂税繁重，尽管家中有临沟坡的几十亩薄地，除交公粮税收外，仍维持不了全家人的生活。每逢青黄不接都要租借别人的粮食。

朦胧的记忆中，旧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惨无人道的旧社会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记得当时全村人靠深井（30丈）吃水，井绳经常被国民党队伍霸占，人们只得去村南的深沟里去挑泉水吃，此后这个沟从此而取名为“担水沟”。一天邻居玉选叔（胜利他爷）家仅有的一头小牛跑到城壕里吃草，被国民党哨兵无辜枪杀。有年正月胞姐桂贤带着我，堂姐桂琴带着金姐去惠家看戏，忽然人群慌乱，有人大喊“队伍来了！”，人们如惊弓之鸟四散逃命。两位姐姐背着我俩在人群中拼命往回跑，好在国民党马队朝柏社方向跑了。还有一天晚上，母亲给我穿好衣服，说广东队伍要来（指

白军，即国民党队伍），要我们去藏队伍，她一个人留在家里看门。全家人分两路，一路是伯父母带三位堂姐去耀县独中舅舅家（伯母娘家），另一路，大哥、胞姐带着二哥及我去杨家河二堂姐家。我太小，和二哥骑在骡子上。藏了不几天，说没事了，我们又安全地回到家里，但全家人心里总很恐慌。

1948年冬，我已五岁了。有些事记忆犹新。一天，给大哥准备结婚喂肥的一头猪被刚进村子，如狼似虎的国民党队伍拉去杀了。大哥疯了似的哭喊着要去追，被母亲及几位姐姐把大门关上拦住，才避免了一场祸事。后来，经伯父百般乞求，才给了我们一个猪头。这件事确实把我吓坏了。据说，同时被国民党队伍拉去的，还有准备给年文英结婚用的一头大肥猪。1949年春夏之交，一天夜里，当我正在熟睡之际，忽然听见场上枪声大作，母亲叫我们都快起来，我害怕的紧缩在母亲怀里不敢出声，大哥爬在窑门底下向外看动静。我看到天窗外的火光很亮。过了好大功夫听不到枪声，光听到杨家河二姐夫杨文贤从场上走下来，说城门楼点着了。原

来，游击队点着了城楼，国民党的地方自卫队看大势已去，被迫投诚了。不几天，人民政府动员附近各村人都来挖毁城墙。从此，彻底拆除了国民党地方武装在西段村的巢穴。天亮了，太阳出来了。人们终于等来了解放的出头之日。

我虽没有见过可怜可悲的父亲，这是我和常人比较缺少父爱且是最大的缺陷和终生遗憾。然而，是父母给了我这脆弱的生命，又是母亲含辛茹苦地呵育着这个生命，使这个生命更加顽强。要不是母亲千辛万苦地护育，要不是兄长、姐姐地百般照料，这个脆弱的生命在人间的存在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是一刹那。

记得解放前后狼很多。1949年秋季，因从小缺奶而瘦小脆弱的我差点被狼扑倒擒走。一天下午，伯父和大哥在胡家坡头地里犁地，伯母、母亲带着几位姐姐在村南上嘴地畔上采摘已拔过杆的棉花，我和金姐随她们在附近的谷子地里寻蜗牛玩耍。突然，潜藏在谷地里的一只野狼向我扑来，我被吓得扑倒在地，狼“唰”一声从我头顶蹦了过去。就在

这岌岌可危的一瞬间，旁边的亲人都惊叫起来，母亲疯了似的不顾一切扑到我身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抱在一边，生怕被饿狼夺去。伯母也把金姐很快抱了过去。野狼见面前都是些脆弱力薄的妇女，蹲在那里，流着涎水，伺机准备反扑这即将到口的美食。这时，母女们手无寸铁，不敢扑打，只是不断地大声叫喊伯父及在地坎下边拾棉花的玉选叔（胜利他爷），好一会，玉选叔跑上来，手持水担，才把饿狼打跑了。母女们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我也被吓得紧紧地畏缩在母亲怀里，不敢离开。狼被打跑后，伯父、大哥隐约听到喊声后，随即赶来，也大吃了一惊。

事后，母亲怕把我吓坏了，“魂”吓丢了，连续三天正午时分，都要给我叫“魂”。记得，当时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走在门口的大路上，不断地小声反复叫着我的名字：“功名呦！回来！功名呦！回来！”让我随着她的叫声回答“回来了！”就这样不断地重复叫着，回答着。真是可怜天下慈母心呀！长大后，我一直回想，这是母亲又给了我第

二次生命。

在充满着血和泪的日子里，母亲整日盼呀盼，盼望望着我快长大成人。

1949 年春末夏初，家乡解放了。这年腊月，家里准备给大哥结婚，这是解放后全家人的第一件喜事。记得伯父去年家背蒸锅，我也高兴地跟着他跑前跑后。婚后，全家人处在一片热闹欢快的气氛中。

二、艰辛的少年时期（1950—1961年）

（一）启蒙教育的小学阶段（1950—1958年）

1950年，我七岁了。二哥开始带我去沟畔学割柴，有时也带我去学校学《看图识字》课本。去了没几天，我就不想去了。直到八岁时，我才正式入学上一年级了。当时学校就设在我家附近“五圣宫”的古庙里。课本是《国语》和《算术》两种。此前，正上小学四年级的二哥不堪忍受教师的打骂体罚而退学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读书。

伯父因受祖父的教诲，早年读过几年私塾，略识文字，深知教子读书的重要。他膝下无儿，重男轻女，几位姐姐从未读过书。他希望男孩能读书成才。大哥、二哥皆先后失学，所以他非常器重我，把读书成才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在我的身上。我们兄弟三人的小名、大名都是他命名的。小名依次是：大哥为“清明”，不仅意在清明节出生，还寓意长

大要有创《清明上河图》人张择端的才华；二哥为“聪明”，寓意聰明智慧；我为“功名”，意在奋发读书，夺取功名，光宗耀祖。当我上到小学二级时（即1952年），他又给我们起了大名：长子大哥为“耀森”，寓意长大要像广阔浩瀚森林里的树木一样，在共产党的阳光照耀下，郁郁葱葱，后世人才层出不穷；二哥为次子，即为“耀林”，意在仅次于森林之下的树林，郁郁葱葱茂密旺盛，人才辈出；我为“耀亭”，是最小的，寓意森林、树林里精美别致、独具一格的楼台亭阁，要更加出类拔萃。记得在一次吃饭桌上，伯父给我们起了大名之后，并对其含义一一作了简要的解释，意在激励我们奋发上进。



尊敬的伯父段善荣大人遗像

最初上学时，老师教用大毛笔写“影格”大字，并用小毛笔在影格行间填写小字。平时练习笔划和字的结构，用白石笔在自己备用的小石板上或地上练习写，并用小毛笔在小字本上写小字，写日记。这样，砚台、墨盒、毛笔、石板等就成了我最基本的学习工具了。我们极少用铅笔。开始，尽管老师教我也不会磨墨、握毛笔，经常弄得脸上、手上、衣服上到处都是墨渍，逗得家里人直笑。我的启蒙老师是雷清芳，学生尊称“雷先生”，经常指点我们“墨要磨稠、人要坐端、纸要放正。笔要握紧。”

刚解放的农村初小教育，仍沿袭旧社会那种呆板的奴化教育。上课不分节次，学生一进教室除上厕所外不许随意出入教室。一天在教室里关三大晌，老是读书、背诵、写字，老师很少讲解。打骂、体罚学生的现象是屡见不鲜。我虽然学习聪明，识字能力强，但开始上学时也是很淘气的。记得上学一个月多，有天早上，我突然给母亲说：“妈，先生把人整天关在教室里不准出来，闷得心慌，我不想去了。”母亲再三劝说我不听。吃过早饭后，

她知道我怕老师，就给老师说了，老师派了四个大点的学生，硬是把我驾到了学校。母亲是慈祥的，但对我和兄姐的教育是非常严厉的。我爱母亲，但我也怕母亲，当我不听话淘气惹事时她也打骂，严加管教。在家里母亲是我的第一位老师。那次事发生后，我再也不敢随意逃学了，学习也渐渐的专心了。老师经常表扬我天资聪明，识字能力强，学习认真，写字恭正，成绩优良，我的学习积极性因而也不断提高。

一九五一年，堂姐焕果（即桂琴）、胞姐宁果（即桂贤）先后分别出嫁于柏社、樊家河。伯父最小的女儿旦旦妹（长大后嫁于惠家惠建新）在此前也出生了。原想生男孩的伯父母失望了。家里人也都觉得很惋惜。不久嫁给本村年家的大姐因坐年炳哲（即位栓）月子后，久病不愈逝世，全家人悲痛极了。母亲带着我坐着牛车和大家一块去墓地参加了大姐的葬礼。此后不久，伯父母和我们分居了。二哥过继给了伯父，我和母亲、大哥、大嫂一起生活。1953年，大哥长子长权出生，这一喜事给全家

人增添了无限的快乐。在此之前，大哥被选为东西段村的行政大村长，段世奎（即段兴林爸，五五年秋因公遇难）任西段村农会主席兼西段小学董事，他热心办学，全力改善学校教学条件。记得当年他和大哥的关系一直很好。

1950 年冬至 1953 年 7 月，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为了巩固和加强新生政权，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

1950 年冬至 1952 年 9 月，全国解放区分期分批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除西藏、新疆外），使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1950 年 12 月至 1951 年 10 月，全国开展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据资料显示，镇反运动中，共歼土匪 240 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 127 万，管制 23 万，

枪决 71 万。

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953 年 7 月 10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赴朝作战，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美帝侵略者，迫使美国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宣告结束。据资料记载，志愿军烈士 183108 人，战斗伤亡减员总数为 366000 余人。中国人民终于用高昂的血的代价赢得了和平和新中国政权的稳定。

经过三大运动，为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华大地历经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已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人们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辛的。母亲除白天干农活外，晚上经常纺线、织布、做针线活到深夜。全家人吃杂粮、穿粗布衣，晚上点棉油灯照明，很少买洋布做衣服。经济来源主要靠养殖及秋季卖棉花收入。因而小学时代的生活更是不堪想象的。上初小的几年里我一直用毛笔，很少用铅笔。直到考高小时答卷也仍然用

小毛笔。上五年级时，大部分学生用钢笔，而我无钱买钢笔，只能用蘸水笔尖写。上六年级时，大哥给我买了支钢笔，我爱心地把它一直用到初中毕业直至参加工作。上初小的几年里，我用的本子是用黄色绿材纸自己装订的。

母亲是我人生中第一位老师。由于我苦难的身世和母亲的谆谆教诲，时时刻刻都在激发着我幼小心灵奋发向上的火花。随着一天天的长大，我渐渐认识到了人生前途理想的实现与少年时期的奋发努力无不息息相关。所以，在母亲的经常教育、鼓励和严格要求下，我从小学习认真刻苦，力求上进。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上二年级时，学校经常来一位卖文具的老翁，我发现有《学生字典》，就很好奇。心想，碰到生字我就不用问老师也能把它查出来。就回家哭着闹着向母亲要钱，母亲把卖鸡蛋仅有的五毛钱给了我，我就买下了这珍贵的识字工具。其他学生也无人买。有了这本字典，我就学着查，并提前预习课文查生字，等到老师教新课，我就能把新课文背得滚瓜烂熟。这本字典是我人生的

又一位老师，它陪伴了我学生时代的始终。

当时初小只有一个教室，一个老师教四个年级的复式班。所设课程也是单一枯燥的，光设语文、算术两科，没有开设体音美课。雷先生就不会唱歌，也不懂体音美。直到四年级换了一位李志正老师增开了体音美，学生学习生活才有了生机。但单一的两种文字课本满足不了我幼小心灵深处对知识追求的欲望。我学习上的模仿性和求知欲望很强，看到那个人的字写得好，就随即在地上画着模仿着写。上四年级时，看到当时发行的《新中国少年报》上，既有国家大事，也有适合小学生的趣味知识，就爱不释手，苦苦给家里要钱订报。当时，家里哪来的钱给我订报，母亲只得借了一元五角钱给我，我总算订了一份。事后她用给人家织布的工钱才算还了账。爱读书、勤练字、多看报，使我不断地扩大了知识视野和思想政治上的上进心。

当今，一般成人对红领巾的看法都比较淡漠。但处于新中国刚诞生不久的少年时代的我，看中心小学戴红领巾的其他学生，就羡慕极了。因为能戴

上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必须具备“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这个“三好”条件，这对一个学生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评价和荣誉。学校准备成立少先队中队，我就积极创造条件。当老师宣布入队名单并决定第二天去新兴中心小学举行入队仪式时，我兴奋的晚上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在一片欢腾的锣鼓声和雄壮嘹亮的少先队队歌之后，我们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一批少先队员给我们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并给我左臂上系上了少先队中队长的标志。这是我人生少年时代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母亲和家里人也为此无比欢欣。

1955 年夏季，我已考上了新兴高小，不幸入学时，我病倒了好长时间，身体非常虚弱，病愈后担心赶不上课，只得在四年级重读。这次重读，对我的学习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学第二遍，我的算术每次考试均为一百分，语文均在 95 分以上。次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又一次考入了新兴高小。

当时，新兴中心小学虽然还很简陋，但教学管理比初小规范得多。每节课四十分钟，开设语文、

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写字及体音美等九门课程。由于我学习比较刻苦，基础好，成绩优异，可算是老师的得意门生。

高小阶段，学生的学习生活都是比较艰辛的。每三天回家背一次馍，春夏秋三季睡在学校教室桌子上，冬季在附近亲朋家里住宿。不过五六十年代，学费都很低。初小一、二年级学生每学期一元，三、四年级一元五角，高小二元，初中三元。书费也较廉价，每册二至四角钱。不过当时货币发行流通量小，价值高。大部分学生家庭仍比较贫穷，解决温饱仍然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难题。1958年春，正值青黄不接，我因家庭当时断粮无面做馍，眼看面临失学，停课三天，上山割柴，后来大哥借了些粮食，才使我复学上课。

上五六年级时，对我印象最深、启发最大的是我的班主任张学进老师。他年轻有为，好学上进，性格开朗，教导有方。他经常教育学生热爱党，热爱祖国，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记得，为了加深学生对《劳动的开端》一课的理解，他利用语文

课堂和课外时间，给我们通读了吴运铎的中篇传记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当时，对我激励很大，我暗自下定决心，向革命前辈吴运铎学习，不怕艰辛，克服困难，刻苦学习，不断充实自己，将来长大也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此后，我除了学好各门课程外，还经常到学校图书室借阅各种课外书籍，不断开阔自己的知识视野。有时还间断地订阅《中国少年报》进行阅读。

上六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全级前茅。当时我们学习很刻苦，我和本村的来保、坤强同班，冬季住在亲戚家里，晚上点上小煤油灯复习功课。凌晨五点就起来，仍然在灯下默读默记课文、笔记。1958年毕业升学考试前，学校要确定两名“免试保送生”，开始确定我和家庭是下中农成分的一名男生，后因我虽然成绩优秀，但家庭是中农成分，而另一名女生虽则成绩次于我，但家庭是贫农，又是革命烈属。因此，我的“保送生”资格被取消了。最终，还是那两名贫下中农学生为“保送生”。当时，我懊悔极了。这也是我人生路上“唯成分论”

对我的第一次打击。我初步认识到政治面貌、背景是多么的重要！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鼓励我说：“不保送了不要紧，你还是好好考吧！”结果，我以语文 95 分、算术 100 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三原县冯村初级中学。和我同时考上的还有本村的段来保（胜利爸），坤强当时未考上，他后来参加了兴平 408 厂的招工考试，被录取了。那时，新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处于幼年阶段，教育投资及办学条件还很差。所以，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没考上而回到了农村务农。当时，社会上人们的文化层次都很低。我们村里正在上高中的学生不过三、四个，上初中的连我也不过四、五个。我算是我们家族几代人中的第一个中学生了。全家人都为我的考中而庆幸。我也决心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刻苦学习，以卓越的学业，报效母亲和长辈，为家庭争光。

（二）奋发攻读的中学阶段（1958-1961 年）

五十年代后期，冯村中学是一所新设的县办中

学。校舍条件虽然较差，但很正规。有学生专用的简陋宿舍、食堂、图书室，各学科常用的实验仪器和体育器材及设施都比较完善。图书、仪器、体育器材的利用率也比较高，完全超过了“文革”后期的七八十年代的农村乡办中学的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但是校舍条件差，没有围墙，学校经常抽时间动员学生到附近河滩扛石头垒围墙、砌水沟，竭力改善学校条件。

1958年9月，我们初入中学时，冯村中学被上级正式命名为“三原县第五初级中学”，简称“三原县五中”。陵马塬区的陵前中学，被命名为“三原县第四初级中学”，简称“三原县四中”。1959年，“三原县五中”，被更名为“三原县冯村中学”；“三原县四中”，被更名为“三原县武字中学”，“文革”中，又被更名为“三原县陵前中学”。

在我就读初中的那三年，冯村中学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是张增石，教导主任杨建文，专职团总支书记屈庆林（不兼课），总务主任刘志祥。王德政老师是我就读初一时的班主任（兼语文），李继才

老师是我就读初二、初三时的班主任（兼化学）。李老师年轻有为，教风严谨，广读博学，管教有方，深得多届学生的厚爱和敬重。当时语文老师王鹏汉秀美、公正而潇洒的板书和详尽的作文批改及讲评，代数老师孟献仁细微而合理的逻辑推理，几何老师朱修己，严谨而恭正的板书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他们都博得了广大学子的厚爱和敬重。

忆往昔，峥嵘岁月，光阴似箭。如今这些曾为我们的学业、德业，付出了自己毕生可贵的年华、才华的师长们，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默默离我们而驾鹤西去。当今，像我们这样已处暮年，两鬓斑白的学子们，都在永远地怀念着他们，怀念他们为我们、为国家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们无私的教诲精神，将千古流芳，万世永存。

在我就读初中的那段艰难岁月，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们六一级是冯中的第三届学生，我被分在“六一甲班”。那时课程设置比较规范，除三个年级均开设政治、语文、英语、代数、几何、

体音美之外，初一设中国地理、中国历史、植物；初二设物理、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动物；初三增设化学、生理卫生。当时，唯独我们这一届没开设外语。

初入高一级的新学府，我感到很新鲜，学习积极性很高。我对各学科的学习都十分重视。做作业、复习巩固、预习新课是我课外时间的主要内容。初一的第二学期，我因荣获全级数学竞赛第三名而获奖。

我上初中的三年，正好是从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度过的。凡是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的人，都吃尽了苦头。其生活的艰难困苦程度是现代人难以置信和无法想象的。

在此之前的 1953 年至 1954 年，针对我国粮食市场出现私商抬价抢购，使国家购粮计划难以实现的极其严重形势，国家对粮棉油等 200 种以上的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逐步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保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统购统销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核心经济制度。

同时，解放初至 1956 年底，我国又分别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确立。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的基本途径是在全国开展合作化运动。最初，三两户人家组成互助组搞生产。1954 年，少数地方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西段村也于当年在新兴塬区最早成立了第一个由 32 户人组成的，命名为和平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段宏儒任社主任，大哥任会计。1956 年，全国全面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面实行土地、牲口、农具等生产资料公有化。收入分配以队为基础，按劳分配，我们这里也随之成立了由东惠、曹惠、雷蒲、西段、东段、马塬、杨凹等十个自然村、十六个生产队组成的和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和平高级社”。段宏儒任高级社主任，大哥任副主任，刘树森任会计。此年春夏之交，大哥被派往省政府在长安县韦曲镇举办的为期半年一期的农村会计培训班学习会计业务。培训期满后，任和

平高级社会计。刘树森被调往最初成立的新兴信用合作社。1958年下半年，全国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化”，并广泛开展了生产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即规模大；“公”即全部实行生产资料以大队（即原高级社）公有，收入分配也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按劳分配。开始，新兴、张坳、嵯峨、洪水四个乡为一个公社，命名为钢铁人民公社，原高级社为一个生产大队，我们和平高级社称为和平大队。由于公社管辖范围过大，难以管理，到1960年又调整为一个乡一个公社。期间，1959至1960年这两年，大哥曾任钢铁人民公社会计辅导，管理和辅导全公社各大队会计的业务工作。大公社解体为一个乡一个公社后，大哥被调回本大队，任和平大队大队长，段宏儒仍任和平大队党支部书记。六五年社教运动前的整十年，和平初、高级社，和平大队一直是省、市、县树立标杆的红旗单位。大哥和宏儒的声誉在全县较高，影响颇大，是新兴乡人所共知的。1958年下半年（即我上初中时）到1961年上半年这整整三年

里，农村全部实行“食堂化”，一个生产队办一个集体食堂，集体吃饭，集体生产。一开始，就把各家各户的锅头都砸了，不许私人冒烟，否则就要受到批判。

在这前后的几年里，大哥的玉玲、民权、平权等几位儿女也分别于 56、58、61 年先后降生。儿女一多，加之“食堂化”，生活负担更重了。

那多年的集体化生产，为改变农业落后面貌，消除贫富差别，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极左路线的推行，农业生产实行“大锅饭”，出工不出力、干部工作上的“浮夸风”、分配上的“共产风”，这些在政策上的弊病给整个国家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以后的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情同手足、可亲可敬的骨肉同胞、全家人的顶梁柱段耀森大哥
于 1963 年 2 月送我参军时在三原留影，时年 31 虚岁

我上初中的第一学期，每月从生产队食堂领 30 斤面和杂粮，交给学校学生食堂办灶，虽则不够吃，但基本上还过得去。但到 1959 年以后至 61 年毕业



1962 年春节全家照。后排左起:我 (段耀亭)、慈母大人怀抱民权
大嫂惠满贤怀抱平权、大哥段耀森 ; 前排:左:玉玲 , 右:长权

就不同了，每月只给二十多斤，尽管我再省吃，但

不到二十多天，饭票就完了。直到六一年毕业，我在学校一直处于饥饿状态。

当时，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学校的政治活动和义务劳动非常频繁，与教育沾不上边的生产劳动安排太多，劳动的时间长而集中，直接打乱了教学秩序，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但师生谁也不敢怨言。不然就是右倾保守，就是抵制教育方针，就是政治立场问题而要受到批判。这是由于当时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对党的教育方针的偏解而引起的一种极端倾向。

记得 1958 年下半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社员都被动员到三原县城，拉矿石、煤炭，用土炉炼铁。我们学校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挖了两个土坑做土炉炼钢。学校收了不少生铁、废锅，用人工搅动大型木制鼓风机吹风，利用每天晚上时间把生铁和煤放在一起混烧“炼钢”，持续了一个月，总算把“钢”炼出来了。事后，我们才知道，经鉴定，炼出来的既不是钢，也

不是铁，而是生铁和煤一起混烧溶解后的化合物。

同时，学校还开展了大办工厂运动。我们班被安排办“炼硝厂”和养猪厂。养猪厂由一部分学生轮流割草负责养猪。我被安排在炼硝厂。我们每周五中午停课找硝土，每晚轮班过滤硝水，平时轮流用大锅熬硝。终于熬出了白色的土硝晶体，但产量太少，微乎其微。这两个厂只办了一学期，到1959年初因粮食困难而停办了。

1958年秋，农业丰收。当时正处秋收，大部分精壮劳力都进城炼钢，农村只剩下了些老弱病残，收获秋田庄稼成了困难。学校为了支援农业，分两次停课，以班为单位驻杨杜村劳动，搬玉米、拾棉花等。每次停课十天。回校后又补课、赶课。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办食堂化初期，母亲被派到本队食堂做饭。大炼钢铁时，又被安排去三原城里给本大队炼钢的社员做饭。我是一个从小就沒有父亲又离不开母亲的孩子。她去城里才不到三个月，我就非常思念。经常夜間做梦到处找她，但又找不着。这样的梦不知

做过多少回。无奈，我利用同学来保周末去三原卖红苕的机会，同他一块骑着骡子，天不亮就起程，进城去看望母亲。由于思母心切，当同乡把我引到母亲住地时，我看到母亲正在案边切菜，激动的泪花一下涌了出来，不知说什么好，走到她面前，拉着她的衣襟，哽咽着小声说：“妈，我想您得很！…我常做梦都在到处找您哩！”当着众人的面，母亲也难过地擦着眼泪说：“妈也想你么！不要哭了，都十五了。”接着母亲忙完手中的活，给其他炊事员作了交代，把我领到附近“明德亭”饭馆，用五毛钱买了一碗炒米饭让我吃。期间，母亲问了我的近况，我仍不由自主地给她诉说着我的思念之情。母亲鼓励我安心学习，不要常想念她，不然就没出息。尽管和母亲待了一个中午，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到了下午，天色不早，我情不自禁地擦着眼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母亲，离开了“城墙下土炼炉林立，街道上煤粉尘飞扬”的灰暗的三原县城。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加之广大农村分配上严重地“共产风”和各

级政府的“浮夸风”，导致全国各地程度不同地进入了经济极其困难时期。“粮荒”是困难时期的主题。各地出门逃荒的人很多。但“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故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停办。直到1961年春夏之交，因困难至极，全国的生产队食堂不得不全部解体了。

最初，是在1959年上半年，饥饿开始向人们宣战。县上为了响应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伟大号召，决定动工修建前咀子水库，引水上塬，改变塬区世世代代干旱的落后面貌。因此，母亲又被派去给本大队民工做饭。几个月未见母亲，我又十分想念。我这个没见过父亲的孩子，是实在离不开母亲呀！学校刚放夏忙假，我就告别兄嫂，约邻村同学曹景合，步行四十里，上前咀子工地又一次探母。当时见到母亲时，她正在忙着和其他人做饭，见她脸上显然消瘦了许多，我心里难过极了，亲昵地叫了声“妈”后，就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使眼眶含着的泪花不要流出来。管灶的建基叔逗我说：“功名，想你妈啦，这次来可不要哭啊！”我

强忍着，勉强地笑了一下，没说什么。然后很快背过身去擦了一下已经涌出的泪水。母亲心里也很激动，但表情沉稳，风趣地说：“现在慢慢长大了，还有啥哭的！”晚饭后，我怀着欣慰的心情和母亲睡在一块，母亲抚摸着我，问寒问暖，诉说着思念之情。

水利工地民工的生活是极其艰辛的。他们吃的是有定量的红高粱面和玉米面，基本见不到麦面，饭量大的人也吃不饱。母亲说她们做饭的虽然辛苦，但还能吃饱。我心里稍有些安慰。待了两天，我准备坐队上的牛拉车回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我也是实在离不开母亲啊！

1959年下半年，饥饿已向人们步步逼来。但我在学校的生活仍然还是艰难的维持着。在学习上，也一丝不苟。前半年，学校开展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劳卫制达标”活动。根据学生年龄，分青年级和少年级两类，要求体育田径类的各项目，全部通过锻炼达标。学生利用早晚课余时间，纷纷参加锻炼。开始学校要求我达到少年级，但经初测大

部分项目都不能达标。因而我就和其他同学利用早起晚睡时间，在操场上跑、跳、攀、掷、翻等作强化训练，每天坚持不懈，最后经过几次检测，终于全面达标。学校给我们颁发了“劳卫制达标”证章。

由于我在校政治进步要求迫切，学习成绩突出，初一数学竞赛又获了奖，进入初二后老师让我担任学习组长。期末考试，除体音美外，各科成绩均达 90 分以上。我被评为“三好学生”。1960 年“五四”青年节，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进入初三后，我又被选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

1960 年，正当我国经济处于极度困难之际，原本人们认为牢不可破的中苏关系，却意外地破裂了。这是我国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

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霸权主义和中苏两党之间在以对待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态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造成的。苏联妄图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以控制中国。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以苏联“老大哥”

的身份自居，埋怨中国“小弟”不听话，对中国当即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制裁措施。

一是苏联单方公开撕毁了 243 个援建合同书，废除了中苏科技合作项目 257 个，全面撤走了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使我国大批经济建设项目和科技项目瘫痪、关闭、停产，大批工厂下马。给我国的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二是，逼迫要求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时期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装备债务，使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三是，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

不仅如此，同年，苏联还在新疆边境多次挑起武装冲突，并在一年后，唆使和公开支持印度在中印边境明目张胆地实施武装扩张，侵入中国领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 1969 年 3 月，苏联又在我国东北中苏边境挑起了“珍宝岛事件”。这一事件苏方失利，却不服输，不甘心，又在中苏边境全线陈兵百万，妄图对中国发动核战争。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直接影响了我国政

治经济的发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苏双方经过数年十几轮的反复谈判，最终都奔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原则，终于达成共识。从1989年5月起，随着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中苏两国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

孰不知，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要有一个良好稳定的国内环境，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和谐的国际环境。

1960年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我国国内经济环境极度恶化，饥饿已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健康。一些中专学校纷纷停办，工厂纷纷下马。学校为了补充学生食物，开展了熬制代食品——淀粉的活动，虽然烧了不少木材，但用玉米杆熬制出的淀粉微乎其微，也很粗糙。大家都说吃起来太糙。我因太饿，还感觉不来。同时，还开展采集野菜活动。同学们除到附近生产队已收过的菜地里进行二次收获外，还到处挖油菜根。由于菜叶菜根并未晒干就入库而轻微发霉，煮在稀饭里吃，味

很苦，大家边吃边唾，唾得满饭场都是。学校领导立即召集全校共青团员把唾在地上的菜根捡起来。炊事员用水淘洗干净，做午饭时又下在锅里。吃饭时谁也不许随意唾，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那时“左”的思想比较严重，谁也不敢“顶牛”。

当时我整天发愁的就是吃饭问题。每天早操早读下来，连上四节课，前两节我还可以，到了后两节课，肚子饿得咕咕直响，口里不断地流酸水，在脚下唾了一滩。到最后一节课，我头晕的几乎坐不下来。这怎么能保证听课的效果呢？即就是到开饭时，我只能有计划地吃一个粗粮馒头，一碗稀饭，一点不敢多吃。不然后几天就没吃的了。那时，城乡许多人因没啥吃都得了“黄肿病”。

1961年上半年，生产队食堂不得不全面解体。一次，我回家背馍，家里已没啥背，完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成立食堂前，任干部的大哥把家里原有不多的粮食已全部上交。万般无奈，母亲含着泪把家里仅有的几斤麸皮装好让我拿上去找樊家河胞姐，让把她家里的黑面和我带的麸皮搅在一起

烙些饼子，带到学校。当时，她家的情况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就这样，我按母亲的交代做了。我参加工作后，听母亲说，那次她送我背着麸皮，走到胡家沟坡头，心里难过极了，又无处诉说。等我下坡后，她在返回路过父亲的墓地旁时，两腿酸软得走不动了，就爬在父亲的坟上，心里难过的放声痛哭了一晌。我听后心里难过地酸透了。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情绪，事后她一直没有给我说过。当时饥饿迫使我确实面临着失学的危险！但我仍然坚定信心地在生命线上挣扎着。当时我的文理科都比较出色。语文老师王鹏汉经常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让我给同学们朗读。但是饥饿的威胁和参加频繁的政治活动，使我的学习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那几年，全国处在一片“反右倾”的思潮中，学校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极“左”倾向仍占着统治地位。经常对学生的批判斗争是屡见不鲜。

记得有一次，一个原任班上团支部书记、学习委员兼学生会学习委员的同学因偷吃了别人的馍而被揭发。学校团总支书记屈庆林（1964年被“双

开”）就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进行批判。会场上悬挂着《看**的本质》的大幅会标。会上结合这个同学的偷馍行为及其他缺点，无限上纲、严厉打击，并宣布撤消了他的学生领导职务，且给予了留团察看处分。

还有一次，学校安排我们采拔学校菜地里的白萝卜，并宣布不准随便乱吃。一个同学在抬运时因肚子饥，偷吃了一个，不幸被人揭发。学校领导突然深夜在师生们都熟睡之际，打紧急集合铃，召集全校师生在操场开会，让这个学生当会检讨，批判他是无组织、无纪律、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等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那个时代，“左”的观念充斥着人们的头脑。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对学生的那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总认为是在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是在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当然一些有头脑的老师就不一样了。只是畏于当时的形势，谁也不敢说。



1961年7月我初中毕业照(时年虚18岁)



我初中毕业时与团支委成员合影
左起：王家盈、段耀亭、焦万一、周秀玲、李秀云

初中阶段眼看快要结业了。学校边动员学生认真复习，准备迎接升学考试；又边动员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因为当时经济困难，国民经济开始进行调整，中专学校大部分关闭下马，不再招生。师范、高中招生比例缩小，而且招生主要是向城市学生倾斜，号召农村学生返回农业第一线，加强农业，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

面对这种形势，作为班上“高材生”的我，思想矛盾极了。心想，如果考上，家里如何能供得起，还是要走中途“失学”的可悲路；如果考不上，我的前途、理想不是成了南柯一梦吗？思来想去，还是先参加升学考试。实质上，处于思想极其矛盾的我，这场考试也仅仅是一个走过程。虽然对考试结果感觉不错，但毕竟这次录生的重点在城里，录的可能性很小。录取结果终于揭晓了，全级八十多学生，仅仅只录了五名。我和绝大部分农村同学就这样“光荣”地回到了农业第一线。

三、坎坷的青年时期（1961-1968 年）

鉴于国家当时的困难时局，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把大办农业，解决粮食问题作为当时的主要方针。

三年困难时期，停办了的工厂、学校的工人、学生都一批批地回到了农业第一线。国家也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减轻国家负担，一批批陆续下放干部和职工也回到农村去，支援农业。胡家沟姐夫柳义斌，原系国营三原县联社（即国营商业系统）职工干部，他年轻义气，政治热情高，早在 1958 年春末夏初，就积极报名，响应党“大办农业，支援农业第一线”的伟大号召，随着三原第一批下放干部的热潮，回到了农业第一线。最初他被下放到新兴乡秦家二队，1960 年又转回本村参加农业生产，直至晚年。

在当时饥饿威胁着整个国家的形势下，未被录取而光荣回到农业战线的我，心理上并没有任何羞

愧感，因为这是大势所迫。但也体会不到回农业第一线的光荣感。反而总觉得这下确实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身上也轻松了许多。面对前途，面对从小的远大志向和抱负，面对农村繁重粗笨的体力劳动，身单力薄的我总觉得今后既不能深造学习，也不能把自己所学的一点点“钢”能用在刀刃上。心想，我这个初中毕业的“小秀才”到底是当一辈子农民还是另谋出路，心里很渺茫，举棋不定，只能是走着看吧。

1961年9月，同学王家盈在我村初小任民办教师。迷茫中的我，经他启发，也申请参加教育工作。经公社审查，我被安排到新兴完全小学任教。当时的校长是崔思义，教育主任惠学智，事务李登科。学校设六个年级共八个班，十二个教师。一至四年级都是单式班，五六年级各设两个平行班。我被安排任三年级班主任，代该班语文课兼二年级算术和体育课。三年级58个学生，二年级54个学生。班大学生多，管教学生成为日常教学中的主要任务。现在回想起当时的那些老师，他们大部分已离世。

当时，我的工作学习生活都很艰辛。因为困难时期未过，吃饭仍是头等大事。我每月从家里拿粮给学校交，月工资仅仅 22.5 元。对于初任教育教学业务，我虚心向其他老师学习。在此期间，马生学、刘宝银老师都给了我很大帮助。

1962 年前半年，由于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全公社除新小、柏小为公办学校由国家负担外，其他各村初小均为民办，由各大队（村）负担。当时，我被先后调往西段、东段任教。六二年后半年，我和段宝奎老师在东段小学任教时，公社对各学校民办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大检查，重新评定工资，我和惠彦俊被评为月 30 元工资，算是全公社十几个民办教师中最高的。在 1961 年至 1963 年元月整一年半的教学生涯中，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好评。我被评为少先队优秀辅导员，光荣地出席了三原县少先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1962 年 5 月，我在新小任教时的留影
(时年虚 19 岁)

1962年后季，针对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公然疯狂而频繁的武装挑衅和入侵，我国政府在国民经济仍处于极其困难之际，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全线展开了为期一个月（10月20日至11月21日）的中印边界反击战，终于打退了印方的武装侵略，粉碎了印度的武装扩张阴谋，夺取了自卫反击战的全面胜利，从而，维护了我国西部边疆的稳定。这是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历史上，人们难以忘怀的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

1962年下半年，经人介绍，我和柏社村因生活困难而初中失学的唐芳云订了婚。此间，我感觉当民办教师出息不大，就满怀雄心壮志和美好的向往，决定抛开儿女情长，暂时离开母亲，报名应征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五师二十五团。为此，家里人根据农村传统习惯，就在六三年农历正月初二给我们两个举行了



1961年芳云（左一）高小毕业时与班上仅有的五名女同学合影

简单的婚礼。由于困难，什么嫁妆、结婚家具也没有。在我参军问题上，母亲老是担心，想不通，生怕我在外边有个什么闪失，我再三给她做工作，她心情才稍有些稳定。记得在我们举行婚礼时，发现母亲站在厨房门口，悄悄地擦着眼泪。可能她老人家在想，在艰难困苦中终于把这个小儿子养大成人、成家了，但到正月初十就要离家参军到最遥远的地方去。她是多么地放心不下我呀！事后她给我说：“你参军几年里，特别是前两年，我晚上总是睡不着觉，有时在炕上一直坐到鸡叫”。真是可怜天下慈母心呀！在短短的几个新婚之夜里，我也经常给芳云做工作，让她善待老人，在家安心劳动，并表示自己在部队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彻底改变家里的贫困状况。她也很通情达理，不断地安慰、鼓励我。我当时的心境很复杂，既新婚恋恋不舍，又决心志在四方。

转眼到了农历正月初十，早饭后，我一一告别了家人。全家人将我送到大门口，大哥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公社。公社对我们参军的四个人戴上了大红



我与芳云婚后，参军前的合影

花，用马拉胶轮车把我们送到了县“三八”旅社集中。当时，本公社去参军的有唐玉峰（妻哥）、张新杰、杨清秀和我。我们到县上后就洗了澡，换上了新军装，领了新被子、床单等生活用品。傍晚，大哥和芳云一起来看我，我和芳云晚上又亲切地相会，俩人再次感到了新婚团聚的幸福。次日，王家盈通过大哥找武装部说情也参了军。

我们在县上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中午，新兵出发前，大哥和芳云向我告别回家。当时，我发现芳云的眼眶里含着泪花，由于竭力抑制，没有流出来。

接着，我们三原八十名新兵乘火车去咸阳集中，在咸阳住了一宿后又乘火车傍晚到达了部队营地——宝鸡市姜城堡（原铁道兵文化学校）。



1963年正月，大哥耀森（右一）、正喜哥（右三）
芳云（左一）于三原欢送我（右二）参军时的合影



参军前，学校领导和老师欢送我
前排左起：惠学智、段耀亭、王敬孝
后排左起：段文全、段宝奎、蒲炳文、惠彦俊



参军时同班同学欢送

前排左起：雷思昌、段耀亭、焦龙海

后排左起：崔思钊、马宝杰、王家盈



全公社同时参军的五位同志

前排左起：张新杰、段耀亭、杨清秀

后排左起：唐玉峰、王家盈

新兵进入部队营地的次日，部队对各地所接新兵进行了整编。我们这个新兵团属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五师第 25 团。我和张新杰被分在了一营三连，王家盈、杨清秀被分在一营四连，三妻哥唐玉峰被幸运地分到了机械连。为了保密，部队对外全部用代号，不用实际编制的番号。经过紧张而有序的军训和考核，我的各项指标均为优秀，荣获了连队的嘉奖。

铁二十五团新兵在宝鸡训练了两个月，然后乘火车向东北黑龙江林海进发。在宝鸡期间，芳云和岳母前来探望我和三哥（唐玉峰），她们住了半个月。我们又一次度过了短暂的新婚蜜月，就这样依依不舍地分开了。这也是大志所迫，无可奈何啊！



我于宝鸡姜城堡军训留影

在宝鸡军训结束后，1963年4月24日，我们从宝鸡乘火车出发，途径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天津、山海关、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佳木斯等到达黑龙江桦川县，后又转乘森林小火车最终到达桦南林区煤窑岭，长途跋涉，历时一周。这里属小兴安岭的皖达山脉，山势不高，全是茂密而高大的松林，简直是茫茫林海，连绵不断，一望无际。这里属针叶林带。部队于当年五月一日到达驻地后，就马不停蹄地砍伐树木，平整营地，搭建帐篷。安顿就绪后，就开始施工，开挖修建煤窑岭隧道。我当时被安排搞混凝土工作，虽然很累，又脏又苦，但我早有吃苦的思想准备，所以还是能适应环境。只是以高粱米为主食，多数人都吃不惯。一天三顿饭，两顿都是高粱米，只有一顿大米或面食。由于能吃苦，而且我经常在板报上投稿，也就经常受到表扬、嘉奖和部队党组织的关注。当年八月，我被光荣地接收为中共党员。这在新兵里，我是首当其冲、独一无二。到了十月初，下了一场大雪，我们班被派往另一驻地大沟线设营，为连队下

一步营地做准备。设营部队远离连队，又无人烟，确实很辛苦。历经半年，到六四年三月，部队完成了煤窑岭隧道的任务后驻进了新营地大沟线。这里没有松林，全是落叶的阔叶林带。森林里一到夏季，天气变幻无常。一会儿炎阳似火，闷得人透不过气来；一会儿又是暴风骤雨、大雨滂沱；刹那，雨过天晴，又是烈日高照。一到秋季，桦树、白杨等的叶子金黄一片，景色十分宜人。冬季到来早，持续时间长，通常气温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到处白茫茫一片，真可谓是林海雪原。据说，小说《林海雪原》中《智取威虎山》的影片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当时部队的任务还是修森林小铁路。其用途主要是完善林区交通建设和用于运输国防设施。因为这里距中苏边界已经不远了。

部队进驻新的营地不到一个月，我被调到连部任连部文书职务。当时，我非常兴奋、欣慰，说明连首长对自己的素质、能力还是十分确信的。脱离了繁重的施工劳动，我的工作不再是那么苦和累，而是变得十分轻松和愉快。这样，我挤出时间抓学

习的机会就多了。从入伍至今，我的军衔连提两级，即从列兵提到上等兵，又提到下士。对于职务和军衔的变动，我都写信告诉家里，大哥和芳云为此十分高兴，纷纷鼓励我好好干。



和同乡战友于黑龙江华南林区留影

左起：王家盈、杨清秀、段耀亭



我任连部文书时与天真活泼的通信员薛杰（中）
司号员王海田（左）在一起



曾参加过解放战争
选调我任连部文书的王学斌指导员

六四年六月的一天，我正在办理连队文书业务，恰好接到了大哥的来信。信中告知了我这样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他前不久给淳化县公安局去信，投诉淳化县方里镇冯寨村劫匪于一九四四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晚在冯寨村拦路抢劫杀害我父亲这一血案。请求调查核实，严惩凶手。此后不久，淳化县公安局给他来函说明：经查实，该犯解放前除犯此案外，还有其他杀人命案，故于解放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已被镇压枪毙，此案已结。看完信后，我从小积压在心底深处的冤结终于被解开了。冤有头，债有主，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个草菅

人命、沉冤整二十年的拦路枪杀惨案，终于水落石出、报仇雪恨。大哥来信所说的这个既令人心酸、又使人振奋的消息，了结了我们全家人多年来的心愿。这件原本令人悲愤现又使人欣慰的大事，几十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

到了当年九月中旬，施工任务基本完成后，部队接到南下云贵的命令，迅速离开驻地，撤出林区，在桦川县城附近一个已废弃的原日本人修的机场休整了一周后，才于当年9月26日离开桦川，乘火车横跨松花江顺着京哈线、京广线横跨黄河、长江一直南下到达广西柳州，又转向西北进入贵州，经贵阳、安顺到达贵州六枝已是十月三日早上。火车往前就不通了（贵昆线未通），部队只得步行走捷径于次日下午终于到达云南省宣威县域内一个叫丁家村附近的蛤蟆岭。在六枝下火车后，我没有随部队步行，指导员让我押一辆装载行军行李（包括我的文件箱子）的地方货车，于次日中午提前到达了驻地。由于当时全国铁路线少，交通不便，这次行军，历时九天，真可谓是长途跋涉啊！

通过这次长途行军，我们亲眼看到了祖国锦绣的山山水水、高原大川、江河湖海、林海雪原，祖国之辽阔、物产之丰富、人民之勇敢勤劳，尽收眼帘。从黑龙江的茫茫林海到耸入云霄连绵不断的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我们穿越了辽阔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渤海之滨，横跨了黄河、长江，饱观了洞庭之滨、桂林山水、南国风光、乌蒙山区……，为祖国之美我感慨万千，深感自豪。

云南宣威蛤蟆岭地处一个陡峭的半山坡上，还住了几户人家。这里是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山高坡陡，沟壑纵横，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交通极为不便。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为支援抗美援越，尽快抢修通贵昆线，使贵昆早日通车。以便尽早运送军用物资，支援越南前线。铁路工程的主要任务是隧道、桥梁、路基等。我当时仍任铁五师二十五团一营三连文书工作。记得当时连长是苗长发、指导员刘书义，可爱的通讯员和司号员分别是薛杰和王海田。

大概到了十一月份左右，营副教导员兰德雁调我到营部接替营文书周义正的工作，（因原营文书

探家并准备提干）我当时无比兴奋，表示一定要认真干好工作。对于营文书的工作，可不比连文书那么简单，即既要完成各类秘密等级文件准确无误地收发工作；还要替首长起草撰写好各类命令、报告、电讯等上传下达工作；又要管好收集好营部本身的各类文书档案工作；同时，还要及时指导好各连队文书的正常业务工作并参加各类营级会议，做好会议记录。确保各类文书工作业务的准确性、保密性、及时性、完整性、系统性，绝对不能出现半点纰漏。并且要经常了解熟悉首长关于政治、军事等事宜的各种意图。脑子里要掌握部队的一些基本数据、信息，紧密配合首长做好工作。由于业务上的精心和政治上的严谨，我的工作经常受到首长特别是宗景喜营长和团直机关的好评。营长是四五年入伍的老兵。他经常给我讲，营文书原来叫营书记，干部职务，工作很重要，随着体制的改变，才叫营文书。六五年三月，我被营首长破例提升为中士军衔（全营 63 年兵才提升 5 人）。六月份，师秘书科科长到我营蹲点，他要一些部队数据、信息，我不用查

资料，对答如流，他很满意，就对营长说要把我带走，调师秘书科工作。营长说：“他还没提干，提干后团宣传股还要哩！”就这样没让我走。

六五年八月，首长准备对我提干。遵照毛主席“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提拔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指示精神，我下到三连暂任班长，准备着手办理提干手续。过了一个多月，部队就对我进行体检。并针对我等二人的提干问题，专题召开连务会讨论通过。



曾参加过解放战争
选调我任铁五师二十五团一营文书的
兰德雁教导员



我（左二）任营文书时
和通信员们在云南宣威蛤蟆岭合影



1966年夏我于四川峨边金口河大渡河畔留影



1966年夏我（右）与战友张新杰（左）
王海田（中）于大渡河畔合影



1966年夏我与战友王振国于峨边大渡河畔合影



同村少年同窗好友段宏轩（坤强，即恒利爸）参军照

过了段时间，团党委派团政委专门找我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

之后一个多月，我一直等待着提干命令的下达。等的结果是，宣布提干命令只有另一个人而没有我。当时，我如五雷轰顶。仔细想，前段时间家

里来信说家乡正搞社教运动，大哥这个大队长被诬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工作组正在酝酿我家家庭成分，想把我家补定为地主成分。可能是这个缘故吧。此后的几个月家中一直未来信，我内心一直闷闷不乐。心想，这下可前功尽弃了。

我们在云南宣威待了一年半，直到六六年三月贵昆线通车后，部队又从云南宣威县境内的丁家村乘火车出发，途径六枝、安顺、贵阳后，又北上经遵义、重庆、成都，然后南下到达乐山县域沙湾附近的轸溪镇，续修 1960 年因苏联撕毁合同、撤离专家而被迫下马停建的成昆线。我当时因未提干而心情不好，经常不想吃饭，人也消瘦了许多，好像患了一场大病。一次，去营卫生所看病时，营长留我吃饭。吃饭期间，我顺便问了句我家成分有无变化，他说：“你家社教中被补定为地主成分，无人戴帽子，你怎么还不知道？”我说家里一直未来信，我心里含糊。首长勉励我重在表现，不要背思想包袱。当晚，我找连副指导员汇报、谈话，从他那里

才得知，前几个月，我的提干命令已下，还没有来得及宣布，第二天连队恰巧就接到了社教工作队给部队发的改变家庭成分的通知书，经指导员请示上级，团政治处答复我的提干命令暂停宣布。这时我才明白，我的提干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夭折的。此后两天，我先后接到了大哥和芳云关于家庭补定成分的来信。后来，我从部队复员时，曾要求从个人档案里看社教工作队给部队发的补定家庭成分的通知书这份材料，指导员很坦然地让我看了。这张油印的仅仅 32 开绿材纸的通知，就这样断送了我的政治生命。虽然如此，我在部队仍毫不懈怠，拼命地工作，但思想上的沉重包袱仍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乐山轸溪镇地处大渡河边，距郭沫若的故乡沙湾不远。我们在这里完成了一个隧道的贯通任务后，于六六年六月又转战峨边县金口河，完成地处大渡河畔的成昆线关村坝隧道附近的一段路基工程。此间，八月份我感染了重度痢疾。无奈，住了十八天医院。在医院里，接到了二哥关于伯父病逝

的来信，我心里十分难过。心想我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

在峨边金口河那段短暂的岁月，是我难以忘怀的。那时，我经常惦念和我一块入伍、久别一直未曾会面、我的初中同窗好友，即三原洪水乡大盘村的姚永强。六五年后期，在云南宣威时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听说永强在新兵整编时，被分在了团后勤处修理连，后又因工作表现突出，被任命为该连给养员。就在九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就迫不及待地约泾阳战友王振国一块去金口河修理连驻地去探望他。

峨边金口河附近的大渡河，地处崇山峻岭中东西走向的峡谷地带。峡谷南侧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河水自西向东如万马奔腾似的上下翻滚着，急流的咆哮吼声在峡谷中常年回荡。北侧云雾缭绕的悬崖峭壁上，人工开凿了一条狭窄而弯曲的公路。一辆辆军用和货运汽车，昼夜不停地在峭壁的公路上小心翼翼地缓慢行驶。附近山林中，不时地传来隐隐约约野兽的啼鸣。真有李白笔下“两岸猿声啼

不住”之感。这里地处深山僻壤，人烟稀少，地势险峻，简直是个不毛之地。我俩沿着大渡河北岸的沙石公路，伴随着河水咆哮的吼声，从西向东疾步直奔金口河团后勤处修理连驻地。

到了修理连，我们久别重逢，异常激动。相互紧握着双手，好久舍不得松开，不断地诉说着久别惦念之情，相互畅谈了我们各自在东北黑龙江林海、云贵乌蒙山区、四川乐山大渡河畔的个人境况及所见所闻。我还重点向他诉说了我因“社教”，家庭被补定为地主成分而没有被提干的委屈，永强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安慰。在我们愉快而欢欣的聚会气氛中，永强利用管理连队生活的便利，用酒菜盛情地招待了我们。下午，我俩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永强的驻地。

两年后的 1968 年，我和永



年逾古稀、曾与我同度军旅生涯、志同道合的同窗密友姚永强，至今朝气勃勃、不减当年

强一块复员。他被安排在咸阳纺织机械厂工作。后几经辗转，退休前，他一直任三原县商业局办公室主任。他人缘颇好，善于助人，文笔流畅，是我几十年难以忘怀的知心密友。

峨边金口河附近的路基工程任务完成后，部队于当年十月初翻越大凉山，穿越彝族区，经美姑、昭觉、西昌到达米易境内成昆线的一个叫大竹林的隧道口安营扎寨。其主要任务是打通大竹林隧道。米易附近的大竹林隧道，地处金沙江上游的安宁河畔。这里河水暴涨，水流湍急，人烟稀少。隧道施工任务难度大，工期紧，几乎没有大的施工机械。

在此期间，到了六七年九月初，连队决定我回家探亲，我准备好行李，第二天就准备坐团部送全团八十名探家人员的专车去成都。不料，晚上刘书义指导员通知我说，营教导员张玉文决定让我推迟探家，说要我写什么材料。我心凉了半截。次日，我去营部领受任务，教导员让我去五连蹲点，专门采写五连副排长周昌伦（我的老班长，贵州金沙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单行材料，准备让他出席

铁道兵部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是一个篇幅较大，质量水平要求较高的材料。我在五连住了二十多天，材料完成后，于十月十三日离队探家。中午，我一个人从驻地附近乘路边过往的部队顺车，傍晚到了米易县城，先找汽车站，做好次日买车票的准备。随后，再住旅社。当时，长途跋涉，路途遥远而陌生，成昆线又未通，只得坐长途汽车。这对无伴孤行的我来说，既是考验，更是锻炼。

次日早，我坐长途汽车时，巧遇了二十四团五营二十二连一个去重庆探亲的战士小王，我俩作伴而行。傍晚，到达西昌。当时正处文革时期，红卫兵全国串联，交通紧张而秩序混乱。听说班车票很难买，有的人在西昌等了一周也买不到车票。当时，排长队买票的人听说班车没到就散了之后，我俩就守在窗口，站在最前边，准备重新排队。结果班车一到，我俩很快买到一、二号票。这下明天乘车就不用发愁了。然后，我们找旅社，到处旅社都是“客满”，很难找。但我们找到了一个军人住的单

间，住了一晚。次日以后两天连乘这趟班车经喜德、越西等地终于到达了甘洛火车站。住宿了一晚，巧遇了两个军人，第二天一早，我们四人结伴乘火车赶天黑才到成都。这已是我出行的第五天了。陌生而人流量很大又很乱的成都，个个旅社皆是“客满”，住宿成了难题。我们顺便随意地跟着几个军人干部走，正好勉强住进了“成都军区军需供应站”。次日，我等四人在市区逛了一天，第三天早各奔征途。一早，我在成都火车站，又巧遇了我们营三个探家的陕西乡党，他们坐部队军车三天就到了成都，而我却辗转走了五天。我们四人结伴一早乘成都至北京的二十次特快始发列车，经过十八个小时，于次日凌晨一时到达西安，由于到处旅社客满无法住宿，只得等到天亮。早八时，我一人又乘火车经咸阳才到了三原。当时，心情既兴奋、迫切而沉重，不知道家里成分变了之后，都被折腾成什么样子。出了火车站，巧遇樊家河姐夫正喜哥给生产队办事。我俩在油坊道喝了点酒，吃了饭，才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的自行车上。两人边走边谈，步行

三十多里于傍晚才到他家安歇。

在姐家的这一夜，姐和姐夫给我诉说了家乡农村社教时，由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引起的跳井、跳崖、上吊自杀的种种恐怖事件；诉说了大哥遭无数次迫害及补定成分后家里被没收了正在居住的窑洞庄子而无处居住及女儿玉玲因急性脑炎而亡的种种悲惨遭遇；还诉说了大哥遭诬陷，要退赔，逼迫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等等。我心里难过极了，也乱成一团麻。一晚上脑海里一直浮现的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整整一夜，我没有合眼，恨不得当时就飞回去看个究竟。

次日早饭后，我推着正喜哥的自行车，和姐姐一块回家。乡亲们见我回来了，都十分高兴，问长问短。原来，庄子被没收后，无处居住，一家人只能搬在壕壕原来的老屋窑洞，和二哥拥挤在一个院子里，母亲和几个年幼的侄儿勉强挤在大门外的一个破窑洞里，当时的居住环境凄凉难堪。回到家里，巧遇大哥磨面回来了，仅三十多岁的他，一脸沧桑，显然消瘦了许多。看见他，我心里一阵酸痛，眼里

含着泪花，不知说什么好，只是问候了一句。芳云下地回来，与我久别重逢，见我后心情激动，表情上略带着少女初婚的羞涩，眼里却含着泪花，不知说什么好。我和母亲打了招呼，她含泪激动地握着我的手问寒问暖。我见母亲苍老了许多，心里一阵痛楚。大嫂忧愁的脸上显得却很精神，她的几个孩子都长得天真活泼可爱。

晚上，大哥、二哥、宏儒、民强等人和我以六五年三原农村“社教”的白色恐怖为主要内容，一直畅谈到凌晨两点方才入睡。在探家的半个月里，我一直走亲访友，还和大哥、二哥一起去父亲、伯父母的墓地叩头祭奠，以表哀思。

探家期间，芳云曾告诉我，六六年元月“社教”刚结束，西段小学教师张宝贤给她说，村上已确定让她担任本村小学民办教师，任低年级教学。后来，因家庭是刚补定的地主成分，大队又另确定了一名贫下中农的媳妇担任了民办教师。我听后，深感惋惜。

瞬间，探家的半个月时间到了。我要归队了。

大哥让母亲、芳云去西安送我（也因母亲没去过西安）。当时交通不便，出门不是步行便是自行车。于是大哥、二哥和炳强三人分别骑自行车带我们三人路过樊家河姐家，然后把我们送到三原火车站，等我们上了火车他三人方才回家。由于事先说好，在西安工作的宏轩（坤强）在西安火车站接我们，说他单位工人没上班，空宿舍多，让我们住在他那里，我就随意答应了。次日，我们四人在西安城内逛了一天，白天看电影、逛公园，晚上看戏。住了两晚，第三天早饭后，芳云和母亲把我送到火车站，等我上了车，她俩才含着泪依依不舍地离去，然后乘火车回家。我乘北京至成都 19 次特快，在成都留宿一晚，后几经倒车方顺利归队。

探家是辛苦而劳累的。但是，我见到了家人，知道了情况，一肚子的闷气终于放开了。心想，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要面对当前，面对未来，顺其自然吧！心情好了，饭量增加了。归队后，体重增加了十斤，大家都说我胖了。

归队后的第三天，连队首长通知我去渡口市

(后改为攀枝花市)“支左”。次日，我收拾好行李去渡口市河门口支左办公室报到。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我颁发了支左工作证，并把我带到建工部五局三公司军代组。这个军代组连我共七人，分两地居住。组长是我营副教导员王春生，东北人，说话流利，很健谈。我和王组长及另一个军代表王崇德住在三公司机关，算是军代组办公室。另四个人住在洗煤厂。我们的办公室坐南向北，房子南窗外边就是金沙江畔，涛涛的江水汹涌澎湃。中小型轮船昼夜不停地在江面上下游动，景致十分宜人。次日一早，王副教导员主持召开了军代组会议，让我收发文件，负责军代组办公室工作，并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渡口市是一个集矿产、冶金、建材、建筑、发电、水运等项目为一体的大型联合企业的山城；且介绍了渡口市当前“文革”形势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抓好“斗、批、改”，促进各派革命大联合，筹建三公司革命委员会。我们每天早坚持学习，还到各单位去宣传文革的“大好形势”，促进各派大联合，防止各种形式的武斗。在这里我多次亲眼目睹了造

反派对各级革命老干部残酷斗争、肆意迫害的种种惨景。我瞎想，今后，干什么事都不要当领导，更不要担任大领导，以免遭受迫害。

短短的“支左”工作四个月过去了。中央军委决定部队大批复员（由于文革，部队三年没有复员，也没有征兵）。我向连队写信，申请复员，连队同意了我的意见。回到连队，我履行了有关手续。接着和一起复原的同志戴着大红花，到一营复员军人集训队集中，进行集训、学习。集训了一个月，部队把我们分批送往返乡的征途。当时，回乡之心之迫切，确实是难以形容的。

四、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及社会和家庭状况的变革

六八年三月复员后，根据当时“哪里来，哪里去”的政策，我到县武装部、民政局和县教育局履行了有关手续，被公社安排到新兴小学任民办教师，工资 30 元。当时新小校长是崔思义，还有像刘宝银、马生学、段逢长等几位原来和我相处过的老同志。我们相处的都比较融洽。为了响应中央关于吉林省“侯、王”二位“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建议”的批复精神，教师纷纷各回各地任教。于是六九年元月，我和段逢长一起回到了本村西段小学任教。段逢长任学校负责人，我负责主管教学业务兼五、六年级班主任和语文课。当时公社的教育专干是段富学老师。

在这期间，由于“文革”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人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贫乏，而我家的生活条件更窘迫，除了财米油盐等非常困难外，日常居住

成了生活一个大难题。和大哥分居后家中只有两孔窑洞，母亲和我们各住一孔，无处作灶房，只得放在大门道旁。无自行车，且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大哥七口人也只住了两孔窑洞，大家都困苦不堪。六九年一月和七零年六月，我的两个儿子新胜和新平先后降生，这给全家人增添了无尽的快乐。然而，乐中有忧。因为收入微薄生活这么困难，抚养幼小的两个孩子就更十分艰难。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党的“九大”，极其错误地将林彪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并正式写进修改后的党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叶群等一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一大批原“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员、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元勋被以多种迫害形式，排斥在外。从此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极左路线更加疯行全国，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的干将和爪牙也遍布全国各地。时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原二十一军某领导，时任三原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原二十一军某

部领导干部刘**、李**一伙，就是当年在陕西、三原推行极左路线的代理人。一九六九年八月中旬，时任三原县革委会副主任、刘**的极力追随者李**带领所谓的“县、社、队三结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杀气腾腾地进驻原和平大队西段村，他们以破第十生产队无须有的粮食投毒案而以抓阶级斗争为名，行法西斯专政、暴力恐怖之实。一进村就扬言，要抓坏人，坏人就是“社教下台干部”段宏儒、段耀森。刚进村的第二天，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找大哥、宏儒、段逢让谈话，并向他们阅读毛主席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完全把他们置于敌对阶级。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工作组成员、干部队伍中的败类、李**一伙的打手孙书机找大哥进行所谓的“谈话”，说他对“社教”补定的地主成分不满，到处鸣冤叫屈，要翻案等许多无须有的罪名。大哥对他的诬陷当场进行了义正辞严地抵制，孙理屈词穷，对他大耍流氓，侮辱人格，并进行暴打，但他始终没有还手，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六五年“社教”，错误地给他留党查看处分，保留党籍，宏儒被开除

党籍），表现了大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下午，我也参加了在新兴剧院召开的全公社群众参加的所谓“宽严大会”，大哥被无辜押上台，对他捏造了要翻案等种种事实，无限上纲，罗织罪名，宣布他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当会受到残酷的批斗。1978年冬，在大哥让我给他代写的平反大会发言材料中写道：“继8月25日之后，8月27日他们又把我押送到三原县东大操场。在此召开的公判大会上，给我宣布了十条罪状，并宣判我为“阶级异己分子”。当时，我想这些人把党的政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会后，我随即找范文义副主任，说这十条都是假的。范难为情地未作回答。军代表王＊＊听后，很同情地说：“你回去，你还是党员嘛！”我想，党章对党员规定的纪律处分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开除党籍，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先给我戴上了个莫名其妙的帽子？何况党章规定，对党员最高纪律处分是开除党籍，根本没有定阶级异己分子处分的规定。而且没让我参加任何党的会议，就把一个党

员置于死地。这样，我完全看清了他们不顾党的原则和政策，疯狂推行法西斯专政的狰狞面目。”这就是当年大哥蒙冤受屈的心声。

在大哥错案未纠正的那几年，我也一直在想：解放后至五七年，党的有关公安政策规定，被专政的敌对阶级分子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五七年“整风运动”后，又增加了“右派分子”，这样，敌对分子共含“地、富、反、坏、右”共五类分子。为什么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小三原县的当权者，竟敢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胆大而妄为、荒唐而离奇地在敌对阶级阵线上，派生出了一个什么“阶级异己分子”，作为象“五类分子”一样的专政对象。充分说明刘**、李**一伙继续步“社教”极左路线之后尘，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完全把自己置于与人民为敌之境地。

此后，没过两三天，大哥又被在蒲家召开的全和平大队群众大会上进行挂牌批斗。当时孙书机赤膊上阵，恶狠狠地押着大哥的脖子，疾步走向会场。大哥对孙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刹时恐怖气氛笼罩

了整个会场。接着不几天，“三结合”宣传队又在东段村召开新兴、张坳、嵯峨、洪水等四个公社更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对大哥进行挂牌批斗，并洋洋自得地介绍他们抓西段村阶级斗争的“经验”。会上，诬陷我的外甥年炳强为其舅父补定地主成分鸣冤叫屈并谩骂贫下中农，而当会宣布开除其民办教师。本村段逢让也被罗织许多罪名而被宣布开除公办教师公职。接着，大哥又先后被接二连三地在雷家召开的党员大会、在惠家、惠家坡、马莲滩等村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进行轮番批斗。在公社新党委成立，并以批斗大哥为重点的全公社党员大会上，“文革”前原新兴公社党委书记、誉满全县的优秀领导干部张政及原和平大队干部段宏儒、雷耀东等被揪来参加配斗。不久，在大队召开的整党会议上，在没让大哥参加的情况下，就冒然宣布开除了他的党籍。

在修建冯村水库的工地上，大哥又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和非人的折磨。县社派驻和平大队工作组成员，曾多次被纪律处分、臭名昭著的干部队伍

中的败类孙书机，经常随意打骂民工。在冯村水库工地，他因多次无故暴打民工，而受到三原县冯村水库指挥部严重警告处分的通报。他平时飞扬跋扈、残忍暴烈、为所欲为。他像日本鬼子监督中国劳工似的，除严厉监督大哥和民工们在工地干活外，还在晚饭后休息时间无故罚大哥劳役。七八年冬，我替大哥写平反大会发言材料时，大哥回忆说：

“修建冯村水库时，全公社工地指挥部设在东段村，和平大队民工灶房设在李正红家。有一段时间孙书机经常体罚我。晚饭后，别人都回家休息，他不许我走，让我给正红家担猪粪。我正准备担，正红父母对孙忿忿不平，赶忙拦住我温和地说：‘耀森，不能让你担，我自己会担’。孙看无奈，又让我给另一家担粪。每次开饭，他不许我像别人一样排队舀饭，先罚我站在院子里，等大家舀完才让我去舀饭……”。我仔细地听着听着，极度悲愤的心情使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两眼满含着愤恨的泪花对大哥说：“哥，不说了，一天也说不完这个干部败类的罪恶，让我赶快给你写”。六五年“社教”前，

一个多年被省、市、县各级多次表彰的和平大队的大队长、多次被评为模范党员的大哥，在“极左”路线的残忍迫害下，竟被逼迫沦落到无法生存的悲惨地步，他的身心一次又一次遭到了严重的摧残。那些惨无人道批斗大哥的惨景，那些非人折磨大哥的暴行，真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在当代没有经历过那些残酷岁月的人，是难以置信的。一九七一年下半年，直到我被调新兴中学任教后，每晚做梦，那些残忍批斗大哥的惨景和肆意打骂、体罚大哥的法西斯暴行仍不断浮现在我的脑际，久久不散。睡觉翻个身，不由自主的都会难过地唉声叹气。大哥及家庭的悲惨遭遇，致使我的心灵深处确是伤痕累累。紧靠我房子（房子上部是互通的）的教导主任王继先，经常问我：“耀亭，听你晚上睡觉为啥老爱声唤，是否有啥病？”我笑着说：“我睡老实了，感觉不来。”实际上，我苦在心里，却违心地笑在脸上。在那些惨无人道的“文革”年代里，惨遭迫害的何止我骨肉连心、可亲可敬的大哥呀！就这样，乌云继“社教”之后又一次笼罩在我们头上，压得

人喘不过气来。由于“文革”极左路线的迫害，社会空气变得愈来愈黑暗，简直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多么渴望有一天中央的正确路线能够战胜错误路线，早一日能够拨开乌云见晴天，争取开辟一个公平、公正的新盛世，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给大儿子取名“新胜”，寓意党的正确路线一定能够战胜错误路线，夺取新的胜利；给二儿子取名“新平”，寓意家庭要有个新的平平安安。



1971年6月慈母抱新平，携新胜留影

七一年十月，我因教学成绩优秀。被段富学专干调到新兴中学三原县塬区“五·七”会计班任班主任兼语文课教学。学员 27 名来自新兴、张坳、嵯峨、洪水等四个公社。会计班设语文和会计两门

课，会计课由潘忠学负责。语文主要教各类应用文和作文教学。我们结合实际，选编刻印教材，管教严格，教学严谨，认真实习，总结经验，最终获得预期良好的效果，得到县、社、校领导的高度评价。



三原县新兴中学“五七”会计班结业留影（前排右一：段耀亭，时任班主任
二排左起：马生学、王继先、段富学（专干）、王景旺、李致志（书记）
蒙树林（主任）、惠学智（校长）、杨荣先、段文全、杨安国）

“五·七”会计班就这样办了一期，第二期因故停办。我被留在新兴中学任语文教学兼班主任工作。当时新中的校长是惠学智，教导主任王继先。七二年十二月，在段富学、惠学智等领导同志的关照下，我被转为正式公办教师，月工资 38 元。这

时，我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出行再不用步行跑路了。从此，我家的生活条件有所好转，但居住条件仍是个难题。（注：段富学，三原县新兴东段村人，曾任三原县嵯峨中学校长12年；退休前，一直任三原县北城中学校长17年。他在三原县教育界颇有名声。惠学智，三原县新兴柏社村人，曾任新兴中学校长，退休前先后在县委宣传部、城关镇、县城建局工作。）

在新兴中学任教期间，由于教育专干段富学和学校领导对我的关照和培养，我针对自己的实际，有计划地、系统地、全力以赴加强自己的业务进修和素质培养，并不断地研究和探讨，提高教学效果的途径和方法，因而教学成绩显著提高，被评为出席县的先进教师。1973年4月，我和新兴中学教导主任王继先、本村小学教师段逢长，段宏杰等公社16位同志，在时任新兴公社党委常委、教育专干段富学同志的带领下，首次光荣地出席了三原县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当时县文教局主持工作的领导是张进业局长。

下面这张 45 年前虽已陈旧模糊的合影照，仍然清晰地记载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兴公社教育战线沧桑岁月中，群英们珍贵的一幕。它勾起了人们对当年美好的回味。这是 1973 年 4 月 13 日原新兴公社出席三原县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全体与会代表，在三原县南大街老剧院开会时的合影。



前排左起：段逢长 杨德胜（贫下中农代表） 张秀梅 段耀亭 杨改明

后排左起：段宏杰 段富学 杨鹏毅 李宁 潘忠学 王继先 杨振峰

崔思义 雷文斌 郝景山（郝左边，此人影像模糊不清）

岁月流逝，当年的群英们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而照片中的段逢长、李宁、王继先、杨德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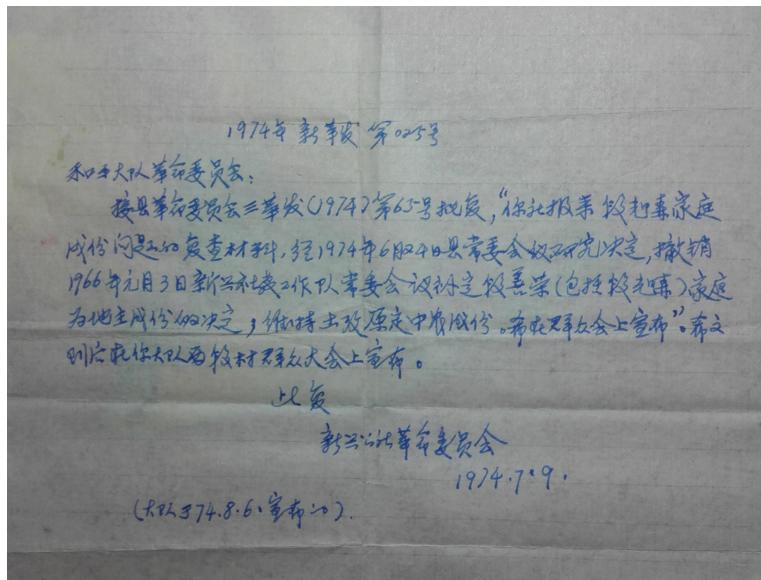
都已作古。

1971年，林彪“9·13”事件的发生，轰动全国，震惊世界。我们党不得不从中吸取教训。1972年，长期被红卫兵、造反派批斗，但仍坚持工作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病逝，已是耄耋高龄的毛泽东主席亲自参加了追悼大会。毛主席这一重大举动，使人们预感到，这是党对落实干部政策开始觉醒的信号。同时党报还刊载了山西省桃园大队在“社教”中推行“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违背党的“土改”政策，扩大打击面，补定了大批地富成分，因此坚决为其平反昭雪的消息。这一切都预示着党内的极左路线将要有所收敛。为此，使我和大哥得到了启发。1973年初，大哥拿了一本《政务院关于土地改革中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补充决定》给我看，按此政策衡量我家解放前三年的家庭经济状况，定地富是完全错误的，而是个标准的中农。说明“土改”时对我家划定的阶级成分是完全正确的。显然“社教”补定的地主成分是极其错误的。

当时为了谨慎，我们以二哥的名义（怕大哥再

受打击），由我执笔撰写了一份《申诉材料》，由二哥抄写两份，然后提心吊胆地托胡家沟姐夫柳义斌送给了县信访办。果然信访有果。到了当年冬季，县委派公社宣传队来我队进行内查外调，经过充分酝酿核实，决定恢复我家原中农成分报县委审批。

1974年7月，县常委会对我家成分进行了正式批复，决定撤销“社教”中补定的地主成分，恢复原中农成分，本队段宏儒、段坪也被纠正了原错补定的地主成分，恢复了原中农成分。



这是我当年依照原批文抄写的我家被撤销地主成分
恢复原中农成分的批文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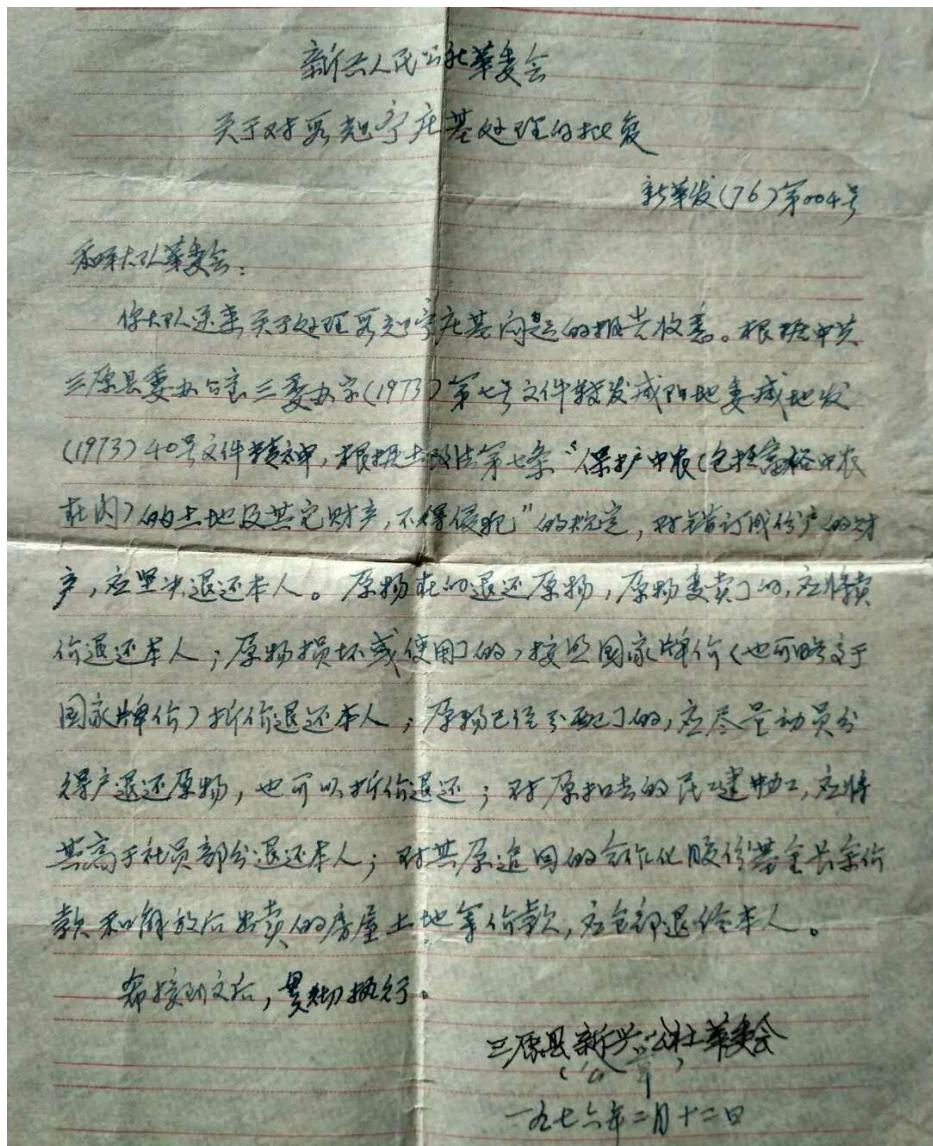
随着家庭地主成分的纠正，和平大队党总支按县、社党委的通知，也宣布恢复了大哥的党籍，撤

销了被错定的阶级异己分子。大约七四年冬或七五年春，公社安排大哥到前咀子水库工地指挥部任渠工队队长。七六年后半年，又被调回本大队，任和平大队副大队长，负责修建惠家蓄水池。七七年冬，大队党总支安排他负责落实党的政策，将“社教”中错定地主被没收的财产或“文革”中被非法抄家的财产，做好分得户的说服工作，使其物归原主。我家原被没收的仅三件破旧桌柜被大队拉回归还。由于极左路线盛行十多年，在少数人脑海里已根深蒂固，特别是在运动中充当急先锋、马前卒的人更是这样。个别不满落实政策的人扬言：“还乡团回来了，现在地富正在反攻倒算。”这种扇阴风、点鬼火的人，最终只能充当了落实政策的牺牲品，无济于事。此后，大队又安排大哥负责建成惠家抽水站。和平大队肢解为曹惠和东西段两个大队后，大哥又任东西段大队大队长。不久，东西段大队又肢解为两个大队后，大哥又任西段大队（包括西段、雷蒲村）大队长。在落实政策中，段宏儒也恢复了党籍。从1977年起，他又任和平大队党总支书记。

自从我家被错定的地主成分和对大哥的错误处理被纠正以后，我家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七五年，二哥段耀林被选为生产队副队长。二侄民权高中毕业后，又光荣地参了军，这是我家成分未纠正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七八年以后，芳云任生产队记工员，大侄长权任生产队出纳。从此我家的政治面貌被彻底改变了，受压迫、遭欺凌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这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74年农历三月，随着我家政治迫害的即将终结，女儿冬梅降生了，全家人喜出望外。为了让她能像严冬的梅花那样，迎雪傲霜，不畏严寒，刚毅顽强，克服女性的懦弱，将来成就事业，因而，取名“冬梅”。这一年生产队又给我家增分了三个孩子的“自留地”，从此，粮食紧张的情况有所缓解。前两年，我们帮大哥打成一院窑洞庄子，这时也住了进去。我也经过多次申诉，费尽周折，冲破阻力，历经两年，直到77年正月终于要回了原来因补定地主成分被生产队没收的那院窑洞庄子。这样，我

和大哥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是我当年依照原件抄写的要求落实政策
要回“社教”被错误没收庄基的公社批复影印件

1976年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而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的文化大革命的整整十年。这十年浩

劫，使国内政局混乱。曾号称“一月革命”的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组织夺权事件，煽动了全国范围内至上而下的全面夺权风暴。“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替代了中央政治局，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各事业单位的一大批主要领导同志都被诬陷为“走资派”而被多次揪斗、打倒。有的被遣送“劳改”；有的被逮捕监禁；有的被长期监管而失去自由；也有的被活活迫害致死。导致各级领导班子严重瘫痪。六十年代末，地方各级各部门成立的、有造反派头头参加的、鱼龙混杂的“革命委员会”完全替代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在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毛主席竭力献媚、无限吹捧，把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神话，提出了毛主席“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天才地创造性地……”等不少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基本逻辑性、而不切实际的崇拜口号。他们大肆设立“文字狱”，对人们很正常的一句话、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很正常的工

作行为都断章取义，横加指责，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妄加分析，无限上纲，好似处处临敌，弄得人们思想混乱，无所适从。记得在 1970 年左右的全县中小学教师暑期学习会上，当时原二十一军军代表、时任三原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的刘**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责教师说：“有人竟敢在学生做作业写毛主席语录的错别字上用红笔打‘×’，这是什么性质？是政治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你打个记号就行了，为什么要打‘×’？”讲到这里，会场一片哗然，啼笑皆非。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一个共产党的县团级领导干部，被极“左”路线冲昏了头脑，竟把教师正常的工作行为无限上纲，指责为“政治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简直荒谬到了何等地步！刘**用这种极左思维方式领导和指导三原县党、政、军的全面工作，难怪三原在“文革”中出现了堆积如山、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给“文革”之后的复查落实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大哥的冤案，仅为一例。臭名昭著、曾糟蹋多名女青年、几乎被处极刑，时任三

原县委副书记的军队干部金**，就是刘**最信得过的得力帮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革”前原优秀的三原县委书记薛文华的回忆录《一个死里逃生的县委书记》中，生动地揭露了刘**推行极左路线的罪行。竭力欲置薛文华于死地，是刘**一伙在三原的代表作，这是当年三原家喻户晓、人所共知的。当时三原极左路线的流行，也是全国整体形势的缩影。

“文革”初期那几年，工人不做工，学生不上课到处串联闹“革命”，搞武斗，连农民都参加了群众组织“闹革命”，美其名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日益衰竭，日常生活的物质产品极其匮乏。国营商店（没有私营商店）柜台上的日用品少得可怜，米、面、油、煤、煤油、布匹、烟、酒、肉、碱、肥皂、自行车、缝纫机等商品都要票证购买，到国营食堂（没有民营食堂）吃饭，也得要粮票。许多农副产品不许上市交易，社员养的猪不许随意屠宰，一定要卖给国营肉店。否则，就是搞资本主义，

就要受到打击和批判。在计划经济的约束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严厉打击资本主义倾向的方针指导下，人民经济生活及物资交流被锁得死死的，涉及到国家政策的许多商品都不许买卖。人民的物质生活简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记得六九年春节前夕，给新胜过满月，过春节，我买了四、五斤猪肉都感到很不错了。七零年农历六月初七，要给新平过满月，我只在岳村生产队的菜园子买了些青菜，到鲁桥镇卖了一头小猪，打算买几斤猪肉，但肉店要肉票，没有肉票不给买。无奈，我用粮票换了一个小伙的一斤半肉票，仅仅买了斤半猪肉。家里没有方桌（方桌“社教”时被没收），就从学校搬了两个课桌对在一起作为饭桌，草草地给孩子过了一个满月。

六八年夏季，我刚复员不久，家里做馍实在买不到碱，许多人就把阴干的灰条杆和叶子烧成灰，用含碱的灰水施面做馍。实在无法，我利用暑假和邻居德有骑自行车翻沟越岭去耀县城里买了些土碱凑合着用。

那时，好几年人们做饭常常无啥烧，买煤要煤票，还要用人力架子车到三原火车站拉。为了生计，我经常利用周末或者假日到嵯峨山下的沟坡里割柴、挖柴，由于割柴的人太多，时间一长，到处沟坡被割的光秃秃的，实在割不下，就挖柴根。直到深冬，柴根也挖不下了，许多人不远百里，拉上架子车，上照金山拉柴，拉柴的人络绎不绝。我和二哥、大哥、长权及邻居于六九年和七零年春节前后，分别先后去过三次，每次去除了拿工具还要拉被子、麦草、干粮、水，以备食宿之用。去时一直是上坡路，光空架子车拉上去，人都要气喘吁吁，浑身发软，实在受不了，何况还要砍柴拉柴。每拉一回柴，往返二百里，得三天两夜，累得人美美得睡三天，精神还恢复不到原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镇工商所叫“市管会”，市管会伙同地方政府将商品贸易控制得死死的，简直让老百姓无法正常交易、正常生活。记得1972年暑假，我骑着二哥的自行车和同村人去淳化县方里镇，准备买些山里人送下来的麸皮，用来换

饲养室的小麦。我当时在方里北的路上悄悄买了五十斤麸皮，生怕市管人员发现。不料，在村口，市管会雇佣民兵小分队将我们八、九个人买的麸皮全部拦截到市管会而不放行。我们百般同他们说理，说麸皮是粮食加工后的下脚料，不是粮食，但他们强词夺理，硬说麸皮是粮食，不能自由交易，否则就要低价没收。我买的还能少些，但大部分每人都买了一百多斤。买时每斤二角钱，如果让他们收去交给粮站，每斤才四分钱，买一百多斤要损失二十多元钱。那时的二十多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两千多元，谁能折得起呀？同去的还有马塬村雷亚娥的父亲雷耀军，他买了一百多斤麸皮，哭诉着请求市管人员放行，但他们置之不理。耀军难过的嚎啕痛哭，大家都幻想这一哭能引起他们的同情而放行。然而，这些市管人员是冷血动物，他们根本就没有人性。即就是大家都痛哭流涕说好话也不会感动他们，更不会感动上帝。因为，在那个年代，上帝也是冷酷无情的。事后过了多年，我才听别人说，耀军那次买麸皮的钱，全部是他岳父给的。后来，我

们都很气愤，一直等待他们放行。直到深夜 12 点，他们淫威大发，像日本鬼子押解土八路一样，将我们强行送到粮站，以每斤四分钱的价格将所有麸皮低价收购。在回家路上，虽则盛夏，但阴冷而透骨的夜风向我们直面扑来，大家觉得寒气袭人，灰心丧气，又冷又饿，心里都在琢磨：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政府的管理部门怎么会出现残害百姓的丑恶现象呢？这个问题，我在文革结束后，直到 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七三年农历腊月下旬，正值寒假，眼看年关即临。我用自行车带了几十斤红苕到方里镇社员家中换洋芋。正好在村口一家，以二斤红苕换一斤洋芋的约定，换了约二十斤洋芋。这家老汉人很和善，说：“最近，市管和粮站在路上查得很严，让我把你送一下，万一碰到就说我是你亲戚送的。”我怕麻烦人家，就婉言谢绝了。由于我的麻痹大意，刚一上路，猛不防就被市管会人员拦住了。我这才发

现，我面前已被拦的有七、八个人。他们很快将我的车子锁住，拔掉钥匙，不许通行，佯称洋芋属于粮食，不许私自交易，要没收交粮站，我再三说明是亲戚送的，他哪里肯信？半个小时后，我的战友方里派出所所长陈述清路过此地，才算给我解了围。

七四年腊月，社会上“打击资本主义倾向”愈演愈烈。认为自由贸易就是投机倒把，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眼看年关即临，集市自由贸易的紧箍咒限制得更死。由于新兴集市上私人悄悄卖肉的人很少，我就和邻居去方里镇买肉。到方里，街上根本没有卖肉的，只有国营肉铺凭肉票买。经打听，山里人粮多，养肥猪多，都把猪杀掉，将肉拿到方里镇亲朋或熟人家里偷偷卖。我们就在每家窑洞庄子的崖畔上转，暗暗打听哪家卖肉。终于打听到了，我们俩都买到了肉，我买了六斤。怕被市管人员查出，我们什么也没买就马不停蹄地上了路。车骑到西阳村北边的路上，老远就发现西阳村口的柏油路上挡了好多上集市买东西

准备回家的人，有五、六十。西阳村口是交通要道，是人们往返的必经之地。但为了避免市管人员的拦截和追赶，我俩像防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匪军一样，快速将车子掉头飞也似的向东北方向的四泉村骑去。四泉村南邻沟壑，我们从小路快速下到沟底，发现惠彦俊、惠彦海等几个同乡的车子上都带着像似粮食的沉重东西，也从这里翻沟“逃难”。我们扛着车子，从南边陡峭的羊肠小道上喘着大口大口的气，终于翻过了沟。过了峡谷似的沟壑，就是三原洪水乡三联地界。我们从野地里将车子推上了大路，绕过了西阳村口的关卡，这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在十年浩劫期间，“粮荒”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难题，七四和七五年，这两年的青黄不接之际，经大哥联系，并带领我们队社员先后分别到陂西乡、洪水乡小盘村借粮（当时粮食很难借）。去陂西借粮的约有十多户人，拉了十多辆架子车；去小盘借粮的队伍更庞大，有三十多户人，拉了 23 辆架子车。当时，借粮前跟人家约定好：今年借，明年还；

借杂粮，还小麦。在那个年代，粮食确实无处可借！

总之，在十年动乱期间，国家政局不稳，经济衰竭，管理混乱，人民生活拮据难堪。当时，除了“抓阶级斗争”、“打击资本主义倾向”，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也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它有力地激励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当时曾被打倒、且在江西新建县机械厂劳改的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了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对各条战线经过一年的整顿，国内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1976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也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一年，同时又是一个清除恶魔、十年浩劫宣告结束、中国从此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政治风云此起彼伏、乌云翻滚，自然界也给国人带来了灾难深重的愁云。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几起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

一是，三个开国伟人先后陨落：元月八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七月六日，敬爱的朱德总司令逝世；九月九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举国上下，人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先后举行了三次隆重的悼念活动。特别是毛主席逝世后，中央通知，各级党委、政府，各人民团体，都要设灵堂，组织群众进行悼念活动。

二是，“四人帮”制造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被诬陷为“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和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被第二次打倒，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国内党内又重新出现了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政治局面。

三是，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震撼世界的7.8级地震，造成了24万人遇难，一百万人受伤。一个偌大的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处于毁灭状态。当时地震伤员被火速送往全国各地医院救治，就连三原的县级医院也住进了唐山的伤员。当时陕西关中的余震强烈、连续不断。人们晚上不敢在房子和窑洞里住，都在宽阔的空地上搭上防震棚睡觉。那一

年，是我们在西段村壕壕住的最后一年。当时正值暑假，我在大门外的空地上用玉米杆搭了一个棚，母亲带着年幼的新胜、新平，芳云抱着仅两岁的冬梅，一块挤在棚里睡觉。我当时冒着风险，仍睡在窑里的炕上。这个睡防震棚的短暂历史，即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在记忆中也是极其模糊的，甚至是没有任何印象的。

四是，在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于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妄想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集团。从此举国上下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运动，全国出现了拨乱反正的良好局面。同时，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决议：一致拥护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在人类社会里，一些自然现象往往也会映衬和预兆着一些重大社会现象的发生，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事物发展的正确预料和意愿。

此年九月底，我刚调任柏社中学不久。一天午

饭后下午四时左右，我在房子里办公，崔思义校长及几个老师忙喊我：“快出来，看天上有两个太阳！”我急忙出了房间，看到西边的天空果然出现了两个太阳，仔细辨认，一亮一淡，一个是真太阳，光线很强很亮；一个是映衬出来的假太阳，光线稍淡。这种天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过了约五、六分钟，光线暗淡的太阳渐渐模糊起来，接着就慢慢消失了。崔老师把这种现象叫“日背弓”，说这是个不祥之兆。古人说：“天上出了日背弓，肯定朝里有事情”。

过了一周左右，学校大喇叭播送了一条震惊人心的好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慷慨激昂、庄严地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宣告：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彻底粉碎。那几天，全国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打着横幅，走上街头，热烈庆祝胜利。这时，我们才联想到“日背弓”这种天象不是对江青等“四人帮”妄想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确切预兆和验证码？当然，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搞迷信，但这种古人从实践

中总结的一种自然现象，预兆相对应的一种社会现象发生的结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它验证了人们对事物发展的正确预料和判断，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共同意愿。“四人帮”篡党夺权是历史的插曲，粉碎“四人帮”是历史的必然，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逆历史潮流者必将灭亡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1976年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年上半年（即2-8月），我被公社派往红旗大队（马莲滩）宣传队，和公社党委李致志书记在该大队第一生产队住了七个月队（这个生产队是李书记抓的点）。我和李书记同住在革命烈属赵和亭家里。李书记工作朴实、认真，原则性强，能密切联系群众，他高尚的品德和朴素的作风，对我感染很深，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在宣传队的日子里，我们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后半年九月，我被调任柏社中学革委会委员，负责教导主任工作，时年32岁。学校领导班子由崔思义、朱宏斌和我组成。崔思义任校长、朱宏斌任总务主任。这个学校属“文革”

中的戴帽初中七年制学校（即小学五年制，初中二年制），学校规模较大，初中两个年级7个班，小学五个年级11个班，中小学共18个教学班，接近千名学生，四十名教师，学校硬件设施十分简陋，教师食宿办公条件和学生学习环境都非常差。中小学合为一校，层次繁杂，分校管理机制缺失，给平时教育教学管理上造成了很大的难度，但我作为教导主任，不得不迎难而上，既管中学，又管小学。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教育教学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我在学校负责主管教育教学工作，工作吃苦卖力，经常不断探讨和总结分校科学管理的途径和方法，采取分校、分层次、分阶段，逐层、逐段把关管理、考核，狠抓教育教学过程管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两年中考成绩，均居全县上游，因而，我被评为县级先进教师，1979年2月，我和已恢复民办教师职务的外甥年炳强一起光荣地出席了在三原南郊中学召开的，三原县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记得当时正

放寒假，去三原时他让我带着从未去过县城的大儿子新胜，让他开阔眼界。会议休息期间，炳强还抽空专门带新胜去火车站看火车，如今时光已过四十年，这件生活琐事我仍记忆犹新。



76-79 年我任柏社中学教导主任时与本校同村教师合影

前排：段耀亭（左）、段逢让（右）

后排：段宏财（左）、段宏杰（右）

1977 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一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这是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举措。

这年恢复高考在冬季举行，春季入学；78 年高考夏季举行，秋季入学。当年和我同在三原新兴柏社中学任教的表弟、民办教师、原三原南郊中学六六届高材生惠彦涛，在我的再三鼓励下，他克服家庭经济和家境的极度困难，也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并被原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顺利录取。1977

年恢复高考，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也改变和拯救了像惠彦涛这样一批批被社会遗忘了的人才志士。几十年来，我的这位贤师良友，几经辗转，他一直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知名教授，曾参与了国家一级建造师考核资料的编辑工作及有关重要的科技项目。在建筑科技领域，他是我们三原新兴塬区一位攀登时代巅峰的佼佼者，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花甲刚过，他随即被聘用到有关高校，继续付出年迈的才华。接近古稀，他仍不遗余力，又被聘用到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任建筑工程学院院长。他卓越的才华和暮年仍毫不懈怠地忠于祖国建设事业的拼搏精神是我们现代青少年学习的楷模。



2018年7月某日，年逾古稀而精神飒爽的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院长惠彦涛同志正在办理公务

忆往昔，恢复高考至今已过四十年，它为今天腾飞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盛世，选拔和造就了多少人才志士呀！

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历史重大转折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里程碑。全会制定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一系列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的正确路线的制定，迎来了祖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春天。全党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理论指导下，随着举国上下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不断深入进行，从中央到地方被迫害而幸存下来的大批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他们重新回到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重要领导岗位上。对迫害致死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同时，中央决定取消阶级成分，人们都不再受阶级成分的约束了。全党工作的重心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国各族人民全力以赴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在北京

召开了历时 36 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全国各地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就陆续大力开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坚决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新兴公社党委于 1978 年冬的一天，在公社大会议室召开了有各大队和各事业单位领导及被平反人员参加的平反大会，并让大哥代表全公社所有蒙冤受屈、遭受迫害而被平反的干部群众发言。大哥在写发言材料时对我说：“公社让我在平反大会上发言，我写了两张多点，被伤透了的脑子乱得写不下去，还是我说，你给我写吧！”我说：“行！”根据大哥的口述和意图，他边说，我边写。我们用了一大晌时间，完成了九页纸的发言材料。他在抄写我写的初稿时，在我写的字里行间，还进行了精心的补充。四十年过去了，至今，大哥亲笔书写的那两张多发言稿和他在我写的稿子上精心补充的文字依然历历在目。每当看到它，四十多年前大哥蒙受迫害的惨景又不断的浮现在我的眼前，又一次伤透了我的心。虽然我将他的墨迹精心保存，但平时看到它又太伤心，还是不想

多看。但我每当想念大哥的时候，还是将他的墨迹反复浏览几遍，以慰心安。大哥在他的发言中，代表被平反人员衷心地感谢党的正确路线，感谢各级党委的关怀和广大群众的同情和爱护。愤怒地声讨了林、江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在三原的代理人刘**、李**一伙及其爪牙在西段村残害干部群众的种种滔天罪行。他列举大量亲身经历、触目惊心、无不令人愤慨的事实，严厉控诉了干部队伍的败类孙书机的种种罪恶行径。在他发言材料的第八页这样写道：“我请求上级党委对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法西斯专政，给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刘**、李**等人，予以应得的惩罚；对多次直接残害干部和群众、草菅人命的打手孙书机严加查处……。”在这次平反大会上，大哥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不泄私愤，胸怀坦荡，高风亮节，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风范和革命情操。他的发言，受到了全体遇会同志的热烈拥护和高度评价，会场上一会是一片同情的叹息声；一会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新兴中学教导主任王继

先亲临了这场大会，他对我说：“你哥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讲得确实好，站得高，看得远，讲得透，是不是你给写的？”我说：“不是我直接写的，是他口述，我代写的。”他点点头说：“你哥还是有水平！”

在此前落实政策中，本村段逢让 1969 年遭诬陷而被开除公职的冤案，也于 1973 年 9 月得到落实，予以纠正。经县教育局专案组复查，县审干办最后的审查结论是：“事实失实，予以否定，恢复公职，补发工资。”对我的外甥年炳强，原遭诬陷而被开除民办教师的错误处理，也于 1978 年 8 月得到彻底纠正，恢复了民办教师职务，并补发了整整九年被扣发的民办教师工资补贴。

下面是大哥亲笔书写而未写完的平反大会发言材料影印件：

王桂许 (1)

本向毛，向文学的对手，迫害农村干的刽子手。
孙中权。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本向毛向文学亲自带领的所谓
县社、公社结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光腾之的
赵佳和群众。他们以破茅十八样农中放毒害，现
所领科学方法，纠正西斯之实。方搞白色恐怖。一些村
就扬言，大队领导班子有坏人破坏，害死坏人，坏人
就是“四不指下台干部”段培公、段知森，正说作“和平
相处讲谈斗争就在你们赵森身上”刚由村的第二天他们
他们找我和岩公商量很给我们读南京政府向何知公
当时我想和数时我们受尽了迫害。今天他们又想把我们
置于死地，我不解冒昧良心瞎胡说，我一定要懂得
党的原则、毛泽东的宗旨和党的优良传统，看他们

(2)

怎样办？由于我设有屈服于他们的三三西斯暴行。

而他们不仁爱的政策，②孙书机的对于给我
摆了十大罪状，给我~~戴~~^戴了阶级斗争帽子，
<我解放那年才十七岁的娃>，开除了我的学生会的教员。
~~开除了我的学生会的教员，这一次~~^{并交}
~~开除了我的学生会的教员，这一次摆足了不实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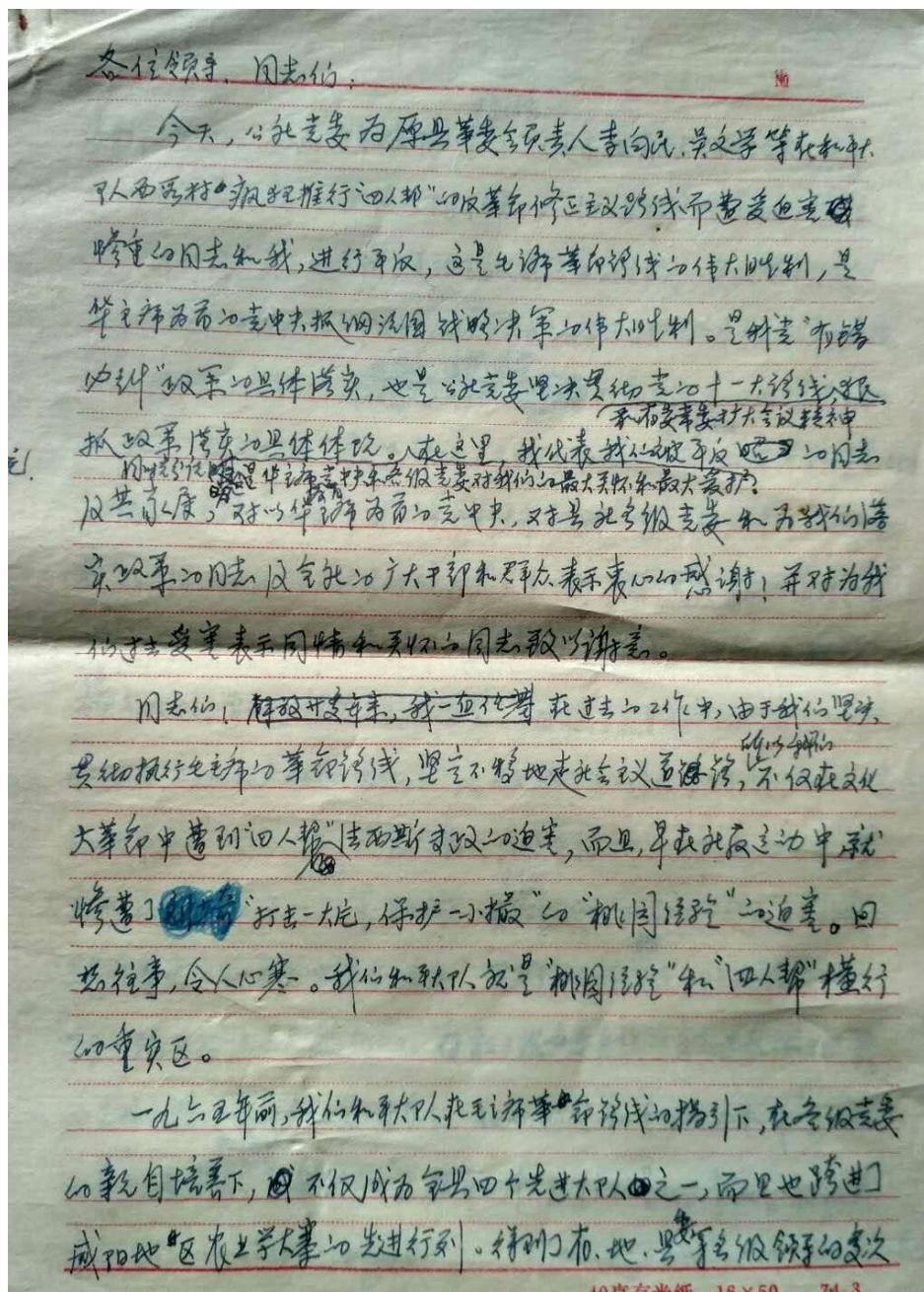
这一次给我戴了阶级斗争的帽子、开除了我的教员
~~他~~^他因怕农协闹事在抗敌开除党籍。将准备
戴项羽反革命帽子，~~他~~^他摆足不下厂集，一告而
终；毒害未破，大以的班子仍然~~他~~^他微从
步和群众同具化，解决大难单位。

孙书机~~他~~^他向民、吴文华大献鬼手。八月二十三
日，下午孙书机叫我说，有“向孙主任~~他~~^他要沟谈
话，我~~他~~^他即去了。是一个军代表和我谈话，叫~~我~~^我

(3)

谈~~他~~^他和宋大以的阶级斗争，我当时想了许多，无从说起
怎样惟一空说，揭露了宋大以真面目，要更正，甚至找
他的生前也难存，只好~~他~~^他人民日报所登的“中国农村改革
道路斗争”谈了以下，他不用听不说，谈无得到他

下面是我为大哥代写的平反大会发言材料部分影印件：



10宣有光纸 16×50 74.3

他老样地吐酒：“你若真点，你的皮鞋干脚穿了屁！”我道：“你
我只回答了他一句：“你是因水干脚而吃人？”他撒野地叫
骂道：“我给你火吃！”我又问了他一句，他琢磨间旁，恍惚是他的方言。叫吉后，把钱打了底，然后要找钱，我说：“没得拿！
元济没有，志诚志良不讲假话。”在深山沟共处，在他对我威逼
期间，还趁机陷害我，他无耻地爬在我身上，想勒死
我打他一下，我没有上他的圈套。他想打不动手，骂不吭声。
(和善地)他想害我可恶地，六事我好)

这一晚全家人因为我的遭际打哭了一场。我母亲哭着说：
“当你高了十九岁干脚，没拿过过大大小小的粮和钱，也没打过人，
难道落了个这个下场。”

李向民、莫文军和刘伟是他的江湖中人。肉中刺。
他给我提了許多没须有的罪名，8月25日下午，
(他)他从北京飞往长沙，召开了新闻“完严大言”会
把我押上船，给我戴上了所谓的自己3700多斤子。8月27日又押
到长沙火车大操场，宣布“十恶罪状”，宣判我为“死刑罪犯”。
1952年8月，找志：这些人把党的双簧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回成都随即找莫文军义妹王红，说这十年都是假的，范未回
去。莫代表王对我叫后，很同情地说：“你回去，你还会走出来的！”

40克有光纸 16×50 74.3

57

10

有的同志食寒致死，有的终身致残，有的妻离子散。飞布山口去
纵情嬉戏，精神上没指望，身体上受摧残，精神上更虚脱，家庭
亲友变株连，子女被歧视。我们回想起过去峥嵘痛苦景象，
感到非常心痛和难过。回想起过去广大群众对蒋的反抗斗争
力量薄弱、欺凌，党的方针政策将遭践踏，更加激励了我们相
互之间严防假义愤。我们受侵害，完璧刘效孔、李向民、吴文华
之流，妄想推卸责任，“四大”便在背后阴谋修改议定书或
造成动。所以，我读书上假意要反对刘效孔、李向民、等人。
 第一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对刘效孔、李向民、吴文华等人的迫害
 大批屠杀共产党员，造成民乱天下大本
 不可逆转
 第二阶段：对直接残害干部、草菅人命的打手
 和走狗，严加惩处。多次动员和教育，
 使广大受害的干部群众解除了精神枷锁，一心一意
 大干社会主义。
 同志们：两年前，以董必武袖率师而归党中央一举打“
 碑”、“四大”，拯救了我们党，拯救救了我们的国家，拯救
 了我们的中华民族，也拯救了我们受害的干部和群众，拯救了我
 们
 40克有光纸 16×50 74.3
 (8)



1978 年慈母和幼年的孙儿新胜（右）
新平（左）、冬梅（中）在一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我国政治经济，已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生机。然而，我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又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坎坷。

七十年代后期，越南政府在前苏联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背信弃义、恩将仇报，无视中国主权和中国政府的一再声明和抗议，他们以军

力自喻为“世界第三”而自足，低估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公然在中越边境频繁挑起事端，任意枪杀中国边民，向中国一方肆意进行了武装扩张，并大肆残害在越华侨。针对越南的罪恶行径，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期间，美方问及中国对越政策时，邓小平胸有成竹而风趣地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此后，我国政府在忍无可忍之际，调集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在中越边境全线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自卫反击战。在有效地打击了越南称霸东南亚的嚣张气焰后，又迅速撤军。迫使越方不得不从柬埔寨撤军，而在北部边境常年陈兵百万，以防中国。从此，中越双方在老山、阴山等边境地区的战争一直延续了十年。一个弱小的越南，豢养了大批的军队，又经不起长期战争的创伤，迫使国内经济衰竭而停滞不前。最终被迫向中国求和。这场断断续续的边境战争，直到1989年方正式结束。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国社会历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它有力维护了我国南部边界环境的稳定，

为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近三十年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它必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打败外敌武装侵略的光辉史册。

从 1980 年 2 月至 1981 年 6 月，从首都北京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

一是，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已蒙冤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决定撤销“文革”中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有罪名，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并适时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

二是，1980 年 11 月至 1981 年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庭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进行了为期两个月零五天的公开审判，使他们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体现了党中央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

三是，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划时代纲领性文献，对党历史上的一系列功过是

非，进行了全面系统、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给予了科学而实事求是的结论，使全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总结经验，汲取历史上一些沉痛教训，决心集中力量将我国经济建设搞上去，是全党今后工作的中心任务。

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逐步稳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全国农村逐步实行生产责任制，把土地、牲口、农具等生产资料分给农民，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温饱问题逐步改善。接着，全国地方各级政府领导机构取消了“革命委员会”，恢复和健全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机构。各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机构，也恢复了“文革”前的提法，取消了“文革”产物——“革命委员会”。原来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又恢复为乡（镇）人民政府。同时，全国从各条战线的各个方面，实行全面改革，解放生产力，逐步彻底铲除了“文革”极“左”路线带来的

各种隐患，把十多年来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还原了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

七九年下半年，我考虑到新胜、新平即将就近上新兴中学，无处食宿，加之母亲年迈，为了照料孩子和母亲，我再三请求领导，辞去柏社中学领导职务，申请回离家较近的新兴中学工作，无奈，公社主管领导违心地同意了我的意见。调新兴中学后，我被安排在教导处工作并兼任初三政治课和政治教研组组长。这一干就是十年。期间，我一直担任新兴中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并曾兼任新兴公社教育工会主席，且连年多次荣获教学质量优秀奖。八三年七月，我被评为县级模范党员，光荣地出席了三原县委召开的模范支部和模范党员表彰大会。当时，新兴中学的校长先后分别是刘如海、张玉民等。



1982年我（下起二排左二）在新兴中学教导处工作时与全体教职工合影



下面第二排左起第七位依次是：
王益志、王金贵、段耀亭、张玉民校长、朱宏斌、张志忠共六位老师



第二排右起：候亚丽、惠芳珍、潘忠学、段耀亭、张玉民校长、

张宝贤、杨讲书、年炳民、王金贵、田润民（共 10 位老师）

第三排右三是：段新胜

八八年十月，杨讲书任乡教育专干后，我被调
新兴乡教育组任业务专干。



1988 年我（前排中）任新兴乡教育组业务专干时
和教育专干杨讲书（右一）在全乡中小学教师大会上主席台上

在此以前，家里的变化很大。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哥虽被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大队干部职务，但因长期遭受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患胃癌，多方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一年四月逝世，时年 49 岁，多么年轻而鲜活的生命啊！后半年他 13 岁的小儿子平民又因放羊不慎掉在沟崖下而丧失了生命。此事对全家人的打击很大。我深感这下全家人的顶梁柱倒了，心里实在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但仍然要面对现实，面对将来。

七九年到八四年，我连续两次对没收要回而破烂不堪的窑洞庄子进行了较大的修缮，居住条件和别人比完全好起来。八八年下半年，新平因家庭农活拖累过重，连续两年中考落榜而主动放弃学业，不再读书。我再三劝解，也无济于事。只得待在家里务农、学木工手艺。

九零年后半年，新胜经在嵯峨、北中几年高中的全力发奋，几经周折，终于高考被录。全家人高兴极了。他被西南交通大学铁道工程专业录取。虽

然属统招统分，学校花费少，但刚起步的家庭经济供一个大学生还是有一定困难的。然而，新胜在艰难的家庭经济环境下，学习仍然很刻苦、学业优秀，为毕业后参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新胜考入西南交通大学

九零年农历腊月，灾难又一次降临我们家头上。初八一早，年迈的母亲突患脑血栓，昏迷不醒。经全力抢救，终于苏醒过来。但不会言语，不能下床，半身不遂，终身瘫痪。全家人情绪紧张，到处求医无果，人人不知所措。母亲瘫痪以后，由于我公务繁忙，不暇照料。服侍母亲的重担自然地落在了芳云和儿子新平身上。当时，新胜和冬梅正在上学。芳云和新平不辞劳苦，不嫌不弃，任劳任怨。他俩既要完成繁忙的家务农活，还要每天几次将卧病的母亲扶起、放下，喂药喂水喂饭，擦屎端尿，

清洗尿布。在母亲瘫痪卧病近一年半期间，他们总是将母亲的卧室清理擦洗得干干净净。他们的孝心孝作，受到了邻居们的一致好评。次年农历七月，由于家中缺人手，既要忙农活，还要照看卧病在床的母亲，只得给新平结了婚。婚后，增加了人手，日子稍微要好过些。但母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一直延续到九二年农历六月十四日，整整一年零五个月，她老人家最终病入膏肓，医治无效，告别亲人，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当时，新胜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在中铁二十局建工处，到单位报名后，急忙返家，他和他婆终于见了最后一面。母亲离世，我和全家人悲痛极了。从此，我再也见不到我终生难分难舍的母亲啊！悲痛之际，我们隆重地安葬了母亲。以此形式来表达我们作儿女的孝敬心愿。安葬母亲后的第三天，我的长孙、新平的儿子段珂降生，由于是男孩，全家人悲中生喜，悲喜交加。

在此前的两个月前，即一九九二年五月下旬，我随县教育局组织的学习参观团赴宝鸡市岐山县参观学习市示范学校的校建工程。期间，我们先后

去岐山周公庙、五丈塬诸葛亮庙、扶风县法门寺游览。在周公庙，我出于好奇心理，抽了一支签，签簿上给我显示了这样一首有趣的诗：“目下如冬树，枯木未开花。看看春动色，渐渐发萌芽。”诗句预示着我的家境目前还像枯木一样贫穷可怜，但春色已动，萌芽渐发，萌芽意指后继人，寓意后继人会有一个新的崛起，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在此之后，新胜大学毕业顺利分配、珂珂顺利降生和健康成长、冬梅九三年高考高分录取等等，就是对这个签簿诗意图奇而有趣的见证。回想“文革”十年浩劫，民不聊生，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耗不断，各类教育事业落后不堪，人为地毁了好几代天资人才和有志之士。前边说过，那时的上帝也是冷酷无情的。“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迫使上帝也睁开了造福人类的眼睛。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飞速发展，多少个家庭也和我们家一样，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个巨变，并非是上帝和老天的恩赐，而是党的正确路线的硕果。对于一个家庭

而言，这个巨变，是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

九三年七月，冬梅高考被陕西财经学院金融投资专业录取，全家人更是异常兴奋。因为在当年统招统分时期，考大学录取率很低，考上大学的难度更大，何况一家能考上两个大学生通常是不多见的。但一经考上，毕业分配是不用发愁的。九四年元月和九六年七月孙女（新平的女儿）段月、小孙子（新胜的儿子）段尧先后分别降生，又给全家人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欣喜。



1993年 冬梅考入陕西财经学院

回想我在任教育组业务专干的九年中，先后和

杨讲书共事两年，与教育专干郝志民（三原陵前干涝池人）共事七年，当时的财务专干是潘克祥同志。那些年，我们密切配合，在改变“文革”后落后的教育教学条件、提高全乡 14 所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同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连年多次获得县、乡政府和县教育局的好评和表彰。我也被评定为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同时，经我在三原教师进修学校进行中师函授学习结业，取得了中师文凭。九七年元月，因年龄问题和工作需要，我和郝志民都分别被调整为新兴和马额乡的成人教育专干，专门负责成人教育。成人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教师和农民。平时既要抓中小学教师的业务进修，又要抓好农民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所以，我一度有两年多在乡政府上班。一是配合乡政府搞好中心工作；二是按照教育局的安排，办好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搞好农民的专业技术特别是苹果作务技术的培训和提高工作。由于工作上的努力不懈，我所办的乡“农技校”经县教育局检查验收，被评为县级示范“农技校”。我也被评为县、乡先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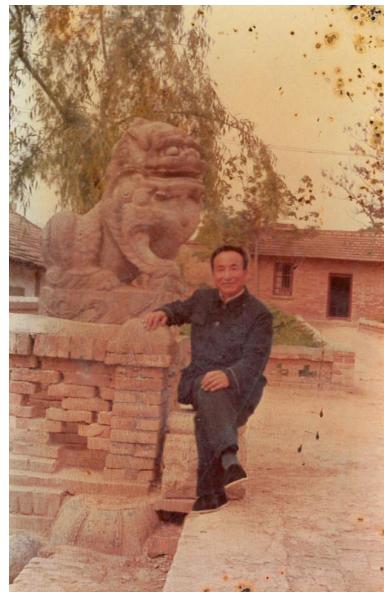
育工作者。



90年代初我（左一）任新兴乡教育组业务专干期间与教育专干
郝志民（右一）在全乡小学生体操表演赛的大会主席台上



90年代初，我任业务专干期间
在全乡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表彰大会上作书面讲话



我在曹惠小学检查工作时在巨大精美的古狮前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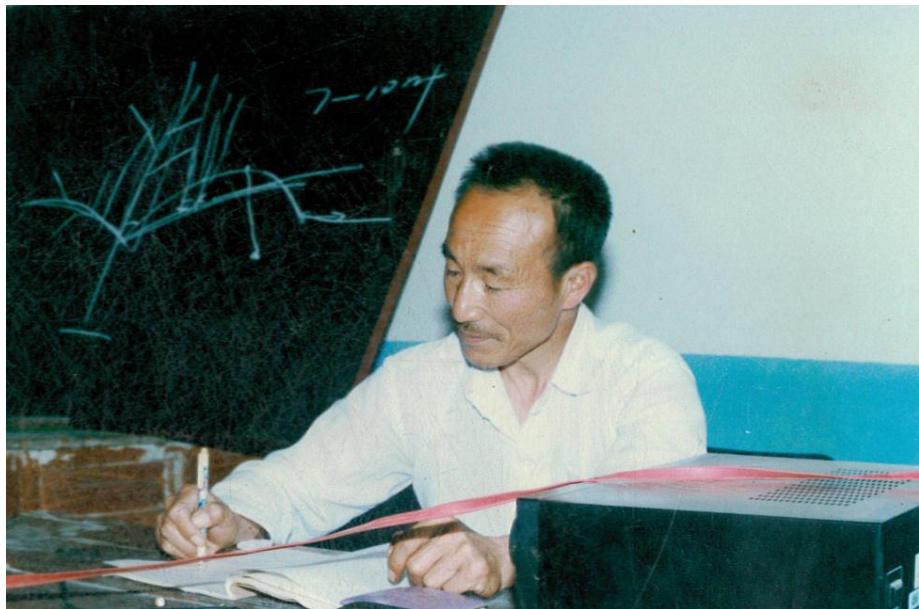


我（左）和教育专干郝志民（中）、财务专干潘克祥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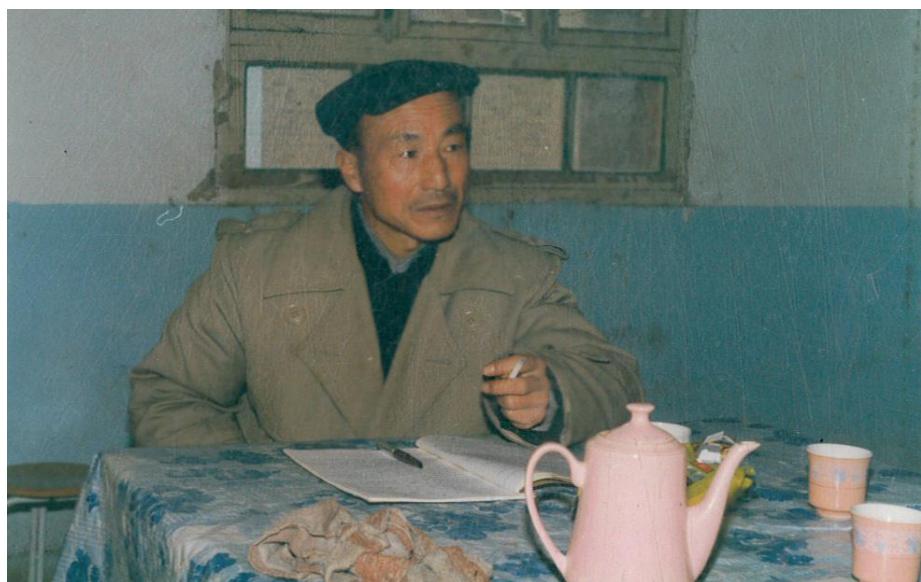
风雨路漫漫 暮年忆春秋



97年元月，我（右）和潘克祥（左）
与即将离任教育专干的郝志民分别留影



97年夏，（我时任新兴乡教育组成人教育专干）
在省果树专家在全乡果农大会上作苹果树作务技术报告时
我正在主席台上做记录



98年初冬，省果树研究所所长在全乡果农大会上
作苹果作务技术专题报告时，我正在主席台上做记录



97年冬，我（左一）和雒志信（右一）、王继民（右三）
带领县园林站专家在曹惠村果园对群众进行现场授课



97年冬，我（右七）等三人带领县园林站专家
在西段村一组马家咀果园正在给果农现场授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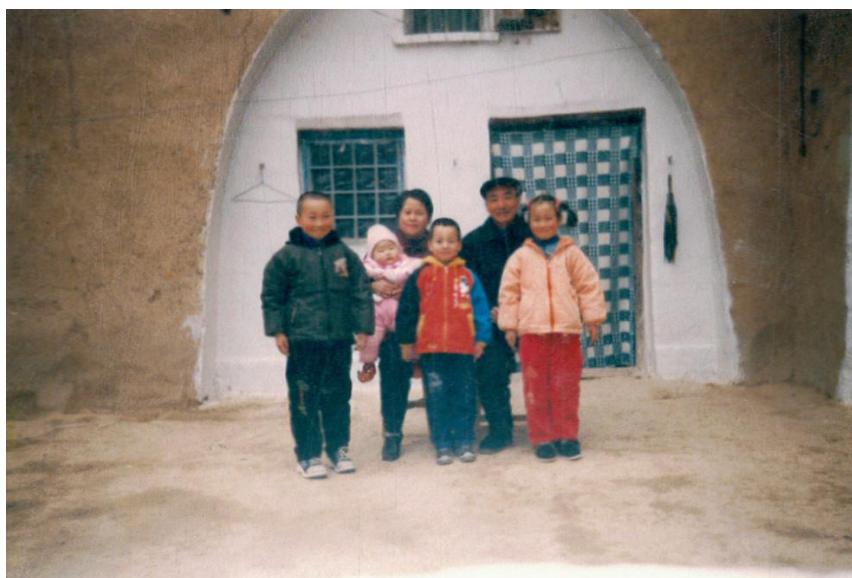
99年春节，我和芳云在窑洞院内
与天真可爱的小孙子段尧在一起

一九九九年九月，我已满55周岁。按县教育局政策规定，应该退出实质性的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因而我不再担任成人教育专干，被任命为新兴乡教育组督导。除配合教育组重点工作外，不再经常上班。

二零零四年九月，我已满六十周岁。按政策我就主动地履行了退休手续。教育组领导给我颁发了《退休证》和退休纪念牌，上写“段耀亭同志光荣

退休”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我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就此终结。回首往事，
历历在目，思绪万千，面对国家，面对先辈，面对
家人，我终生无愧，也无满足。



2002年春节，芳云怀抱刘歌扬和我
与幼小可爱的孙辈们在窑洞院子欢聚一堂
前排左起：段珂、段尧、段月

忆往昔，岁月沧桑。如今，我已年逾古稀，但仍不时地惦念着我在漫长教育生涯中的学子们。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内外的各个行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都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其中，有的虽是一介平民的劳动者，但能忠于事业，安居乐业；有的是国家机关或事企业单位的局、处级领导，但都能廉洁奉公、忠于职守；有的是在各条战线上，获高级职称的人材志士，但他们都能默默无闻地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付出自己的心血和才华；……。

为此，我每闻他们事业的点点滴滴，都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这也是我终生无愧的一个重要缘故。

尾声

二十世纪末，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迈开了前所未有的步伐。国家经济形势飞速发展，广大村民也逐渐富裕起来，居住条件在不断提高，完全不再建土窑洞，而是在新规划的居民点进行砖混结构的房屋建设，这样既节省了土地，也大大地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此，我于二零零零年就开始雇车拉砖、买木材，筹备建房事宜。次年夏季，我有生以来梦寐以求的第一院两层新楼房终于落成。经过精心装修，二零零三年六月，我们全家人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乔迁新居。从此，我家的居住条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前侄儿民权、平权也建了新房。二零零七年，大侄长权、二哥的政权侄儿的新房也先后落成。我们这个家庭、家族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也就逐渐变得愈来愈富裕，发达兴旺。



2001年，我有生以来梦寐以求的第一院两层新建楼房终于落成，这是房屋正面全貌

我的这部传记最初是从回忆母亲、长辈、祖辈开始的。为了永远怀念母亲，报效祖恩，教育子孙，了解家史，启示后人，二零一零年清明节前，我经

过精心筹备，并打破农村以往传统上坟祭奠过于简单的陋习，略仿国家公祭的形式和内容，全家族人在母亲大人墓前庄严隆重地举行了“慈母老人纪念碑落成典礼揭碑仪式”，并全程进行了录音录像。母亲和大哥的陵墓都地处村南上家咀南坡边上，距离西边的公墓还有百十米远。这里背靠辽阔的新兴塬区，东北方遥远的耀县药王山隐约可见；西邻巍巍的嵯峨山；墓地正南方一千多米远便是清澈如湖的冯村水库。真是依山傍水、风景如画。多少懂点《易经》的人到此都赞许地说‘真是一片风水宝地呀！’长权率众弟兄在陵墓四周栽植了十几棵柏树，把陵园围了起来。这里现已是绿树成荫，郁郁葱葱，景色十分宜人。

这次揭碑仪式，由于准备充分，对下两代人的教育非常深刻，启发很大。教育形式、内容和效果，都是前所未有的。母亲大人这座宏伟高大的纪念碑，从交涉买石刻碑、到起草碑文、祭文等书面材料，我都经过了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并亲自经办的。当时有关的祭母祭祖的书面材料每户存留一份，以

作永久纪念资料。仪式举行完后，全家族人在我家集体会餐，重忆家史家风，缅怀祖辈。所有立碑、会餐的经费，都由我一人主动承担。在繁琐的立碑工程上，大侄儿长权率民权、新平及媳妇亚丽等精心设计，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和心血。

为了永远怀念先祖，怀念慈母，怀念长辈，启示子孙后代，特将《慈母老人纪念碑落成典礼揭碑仪式》和《祭文》等资料原文刊载如下，以作家史的永久性纪念资料。

慈母老人纪念碑落成典礼揭碑仪式

主持人 不孝儿·段耀亭

一、全体肃立，按辈分各就各位。

二、深切怀念和隆重悼念先祖。

首先，让我们深切怀念和隆重悼念我们的列祖列宗（请向我们的列祖列宗庄严叩头）；

其次，让我们深切怀念和隆重悼念曾壮烈阵亡在辛亥革命前线乾县保卫战的我们可敬的祖父、你们的曾祖父、你们的高祖父段启文老人和我们的

祖母、你们的曾祖母、你们的高祖母潘氏老人（请向二位老人庄严叩头）；

第三、让我们深切怀念和隆重悼念曾经养育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可敬伯父、你们的大祖父、你们的大曾祖父段善荣老人和我们的大伯母、你们的大祖母、你们的大曾祖母闫氏老人（请向二位老人庄严叩头）；

第四、让我们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怀念和隆重悼念曾于一九四四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被害殉难、我们年轻而可怜的父亲、你们的祖父、你们的曾祖父段兴荣老人和历尽艰辛、含辛茹苦亲手养育了我们一家几代人的我们慈善而可敬的母亲、你们可亲可敬的祖母、你们敬爱的曾祖母雷清贞老人（请向多灾多难的尊敬的二位老人庄严叩头）；

最后，让我们又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怀念和隆重悼念，少年丧父、又曾经是我们全家人的顶梁柱、并抚养我们成长、且身受磨难的我们情同手足的大兄长、长期任农村基层干部、优秀的共产党

员，你们可亲可敬的父亲、你们尊敬的誉满乡里的大伯父、你们尊敬的大祖父段耀森大人（请向大人庄严叩头）。

滔滔清河常流水，巍巍嵯峨立云端。

山河常在，人济繁衍。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的列祖列宗及以上千古的诸位老人英魂常在，萦绕人间，名垂青史，遗训永存，保佑你们的子孙后代，家族兴旺，开创业绩，人才辈出，盛世辉煌，代代相传。

我们决心牢记你们的遗训，继往开来，开创家业，发誓立下鸿鹄志，成才报恩尽孝心。我们决不辜负你们的遗愿，奋发努力，光宗耀祖，报效祖恩。

三、鸣炮揭碑（段桂贤、段耀林）。

四、恭读碑文（段耀亭）。

五、敬香、奠酒（段耀林率众三叩头）。

六、敬献祭品、鲜花（按辈分由高到低分批敬献）。

七、恭读祭文（段耀亭）。

八、致辞（段长权、段珊珊）。

九、鸣炮、烧纸，全体叩头。

十、慈母老人纪念碑落成典礼揭碑仪式恭告结束。

祭 文

不孝儿·段耀亭

庚寅之年，清明佳节，为报母恩，树碑悼念。
缅怀慈母，雷氏清贞，终生坎坷，历尽艰辛，
养育子孙，任劳任怨；一世贤慧，善良处世，勤俭
磊落，誉满乡邻。

缅怀慈母，生身雷家，诞辰民国，正值初年，
兵荒马乱，盗匪横行，幼年多灾，丧兄丧父，母女
二人，度日如年。时值十二，偶丧母亲，家业破落，
无依无靠，孤寡难堪。多亏姨母，收养屈家，年方
十五，过早出嫁。养儿育女，度日平淡。时值二九，
青春年少，正当月子，惨遭祸端，丧夫丧女，痛苦
难堪，日以继夜，泪洗容颜，身心摧残，病体缠身，
托儿带女，遭受磨难。

缅怀慈母，秉性刚直，为养儿女，坚守贞节，

女中人杰，高尚风范，贤妻良母，堪为楷模，享誉乡邻，家喻户晓。

缅怀慈母，持之以恒，功到自成，时值解放，儿娶女嫁，三八得孙，享乐天伦，勤耕苦织，供儿读书，年过半百，儿孙满堂，养育孙辈，乐在其中，受尽煎熬。时值六四，四世同堂。年过古稀，曾孙满堂。晚年安度，修身养病。喜闻孙辈，三上大学，高兴之余，欣喜愈加。七六病瘫，全家皆慌，千方百计，求医无效，晚辈尽力，服侍床前，夜以继日，报恩尽孝。时过两载，病入膏肓。笑对人间，安详九泉。

缅怀慈母，恩重如山，情比海深，千古难报。

子孙铭记慈母训，人才济济家业旺。

衷心祝愿，慈母英灵，永存人间，慈母风范，千秋万代，名垂青史。

（祭文完）



2010年清明节午时整，慈母雷清贞老人纪念碑落成奠礼揭碑仪式隆重恭告结束
(纪念碑正面)



慈母老人纪念碑落成奠礼揭碑仪式恭告结束后正准备鸣炮
(纪念碑背面)



慈母大人和大哥的陵地依山傍水。这里现已是绿树成荫，郁郁葱葱，风景如画
(2018 年清明节，段耀亭摄影)

大哥的长子长权是慈母大人三十八岁时喜得的第一个长孙，故对他从小就爱如掌上明珠，护如心头肉。在慈母老人隆重的揭碑仪式上，大侄儿

长权代表全家族人致辞，他深切怀念了祖母辛苦养育和谆谆教诲的难忘岁月，高度赞扬他可亲可敬的祖母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女性，不愧是女中人杰，号召全家族人要永远继承和发扬以祖母为代表的列祖列宗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使我们的家族，永远团结一致，兴旺发达，盛世辉煌，代代相传。侄孙女珊珊也代表孙辈作了推心置腹的发言，“定要誓立鸿鹄志，成才报恩尽孝心”。

“慈母恩情比海深，千叩万拜难报恩，惟有誓立鸿鹄志，成才报恩尽孝心”。这是慈母老人纪念碑背面的几句悼念启示语。寓意着要报恩就要立志成才，要成才就要发奋读好书，敬业爱业，不断提高自己。这多年的实践证明，孩子们都做得很出色。在我下一辈孩子中，几个大学毕业多年的孩子工作都很突出。大哥的大女儿段慧（2014年病故）在南郊中学任教十多年，已获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教学业绩卓著，也为她十多个侄、侄女们上大学费尽了心血，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全家族人都在时时刻刻地永远怀念着她；大哥的小女儿学慧硕士研究

生毕业后，一直任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系主任、硕士生导师、淮北工程咨询院特聘专家、安徽省经济学学会理事。这些耀眼的头衔，都是她天资智慧和辛劳博学的结晶。新胜已是多年的高级工程师和国家一级建造师，曾担任多年项目总工程师、项目经理、书记，以及公司副总工程师，现任中铁二十局集团西南四省（区）（即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指挥部工程处处长。他不忘初心，立志博学，善于研讨，我曾亲眼目睹过他撰写的多篇获奖科技成果、工法、论文等书面材料，他为祖国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事业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女儿冬梅已在阎良区农业发展银行工作了二十年，业绩突出，获高级会计师职称和美国管理会计师证书，现已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安市阎良区支行行长兼党支部书记…。女婿刘纳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阎良中国试飞研究院工作，他不仅十多年前就获高级工程师职称，现已是任职多年的正处级领导…。在我的孙辈孩子中，大侄长权的儿女段茜、媛媛、珊珊、段魁，二侄民权的儿女段

博、凡凡，三侄平权的儿女段萌、莎莎、甜甜，都先后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其中，媛媛在南京、段萌在厦门、段魁在咸阳工作，其他孙辈大多数都在西安工作。二侄民权的大女儿娇娇、四侄政权的大女儿艳芝虽则未上大学，但婚后他们两家经商有方，均在西安购房安居。政权的二女儿敏艳于榆林学院本科毕业后，也一直在西安工作。我的长孙即新平的儿子段珂也于二零一一年考上了西安石油大学，二零一五年毕业被应聘到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工作。孙女段月也于二零一三年考上了西安工程大学会计专业，于二零一七年六月毕业已被中铁二十二局集团五公司招聘参加了工作。我的小孙子即新胜的儿子段尧天资聪明，不甘落后，继往开来，也于二零一六年高中应届毕业生后，一举考上本科河南工程学院会计专业。冬梅的女儿刘歌扬于二零一六年中考前，被西安八十三中（重点高中）提前破格录取，学业异常突出。真是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孙辈们都能奋发努力，真正做到“成才报恩尽孝心”。



侄女段学慧在南京财经大学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专题发言



侄女段学慧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专题发言



段新胜于 2016 年 3 月 5 日在南宁召开的中铁二十局集团
西南四省区工程项目管理会议上讲话



段新胜 (右二) 在贵州省普安县中铁二十局集团六公司
检查工程项目时在项目部会议上讲话



段新胜 2018 年 1 月 5 日于昆明，在中铁二十局集团云南片区
工程项目维稳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段新胜（左一）于 2018 年 4 月 15 日在昆明，对中铁二十局集团一公司承建的呈贡区
大渔城市综合体工程项目和五公司承建的昆明昆铁锦绣家园工程项目进行检查，
并组织两个项目领导及有关人员观摩交流



段新胜于 2018 年 5 月初赴藏检查在建工程项目时，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留影



2018 年 1 月，时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安市阎良区支行行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女儿段冬梅在支行主持召开党员组织生活会（正中：段冬梅）



2017年9月，女儿段冬梅参加农发行陕西省分行在延安枣园举办的全省支行党支部书记培训班。这是省行领导和西安地区十个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的合影（前排右二：段冬梅）



2018年5月19日，农发行阎良区支行行长兼党支部书记段冬梅组织全体员工一行二十人，赴铜川市照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前排中，即左七：段冬梅）



21世纪初，女婿刘纳已获中国试飞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职称
并任正处级领导职务



2016年8月，全家人在西安庆祝段尧应届高考
一举考入本科高校的宴会上，我满怀喜悦致辞

回想起我们这个家族，在旧中国充满了血和泪；在新中国的初年，又幸福地享受了共产党阳光

沐浴；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教”和“文革”中，又蒙受了十多年的不白之冤，几乎家破人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近四十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辉煌巨变，我们的家族也随之家业兴旺，人才济济，辈出不穷。这是大哥生前多么梦寐以求的终生遗愿，也是党的正确路线对他蒙冤受害的补偿。这么多年，儿女们、孙辈们的学业有成，事业有成，我做梦都渴望大哥在天之灵能够感应到这些令人欣慰的变化。如果真的那样，他已严重创伤的精神世界，一定会得到幸福的安慰。

随着党的富民政策的不断深入，村民的生活生产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年，国家不仅免征农业税，还对种地的农民实行粮食补贴，对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免缴学费；对城乡居民就医实行“医保”；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养老金；对高龄老人实行分层次发放高龄补贴；在扶贫脱困、财政、就业等方面，采取了更多惠民政策……。这些利国利民举措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农村原有的土窑洞被全部推平，进行复耕。大家都在

新规划的居民点上建起了一排排整齐的砖混结构的平房。人们不仅早在八、九十年代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如今经济收入大幅上升，绝大部分已奔向小康水平。我们乡村村通水泥路，我们村所有街道全部进行混凝土硬化，达到雨天脚不沾泥。我们这个家族每家除备有各种农用车和农用机械外，都购置了电动车、摩托车和小汽车。每家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年纯收入每户均在五、六万元以上。二儿子新平的主导产业主要经营油坊和作务苹果园，年收入还是不错。和过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和芳云为了照看小孙子段尧上学，在三原县城住了整整七年。2013年7月，新胜又将我们转往西安居住，让我俩首次享受大都市的居民生活，安度晚年。

进入花甲之年后，儿女们为了丰富我们的晚年生活，开阔眼界，引领我们多次出外观光旅游。

2008年3月初，新胜借出差之机，领我和芳云去南方旅游。我们从咸阳国际机场乘飞机，途径贵阳机场少停片刻后，又飞往广西南宁机场。这是我和芳云第一次坐飞机，心情异常激动。我们在南宁、

北海、桂林等地旅游后，乘卧铺火车返回西安。在南方，我们尽情地观赏了初春的南国风光、海滨美景、桂林山水。芳云在北海海滨伸往大海深处的望月桥上异常感慨地对新胜说：“我这辈子就算把飞机坐了，大海见了，我很满足了”。



2008年3月，我和芳云在贵阳机场（新胜摄影，下同）

风雨路漫漫 暮年忆春秋



2008年3月，我和芳云在美丽辽阔的北海银滩海滩公园内的
巨大精美的钢塑“潮”前留影



在壮阔美丽的北海银滩，我们站在茫茫无际的大海边，
眺望波浪滚滚、美丽富饶的北海银滩



芳云在北海“得月亭”下伸向大海深处宏伟壮阔的海桥上感慨地对新胜说：
“我这辈子总算把飞机坐了，大海见了，轮船坐了”



我们在桂林漓江游船顶层的观光台上尽情的观赏风景如画的漓江山水



我们在景色优美的桂林火车站广场

2009 年立秋之后，正逢学生暑假，新胜出资，催促我们上京旅游，我和芳云、段尧，协同曹艺彬及惠家坡三姐（芳云胞姐）一块随旅行社去北京、天津旅游，历时一周。我们去时乘卧铺火车，返回时乘飞机。途径宁夏中卫至咸阳国际机场。我们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合影，并先后游览了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天坛公园、长城、鸟巢、天津周恩来和邓颖超纪念馆、塘沽港等著名胜地，这是我终生难忘

的一件罕事。在八达岭长城，有人给我们烤瓷了两个八达岭长城纪念杯，我和芳云的彩色照片永存杯上，以作永久纪念。

2011 年以后，新平开车领我和芳云等几位老人先后去黄帝陵、耀县药王山、富平习仲勋陵园、纪念馆、照金革命根据地等观光旅游。

2012 年春，新胜借出差之机，又领我去太原一游，我们游览了著名的“晋祠”，尽情地观赏了太原古城和汾河风光。



2012 年 4 月 7 日，我们专车赴黄帝陵、药王山游览

这是在公祭轩辕黄帝的公祭大厅前的公祭台上

（左起：段耀亭、惠芳霞、段耀林、唐芳云、段宏财、白淑玲）（段新平摄影）

2014 年 10 月初，利用国庆假日，新胜、张丽（新胜之妻）开车带我和芳云去乾陵、扶风法门寺等地旅游。接着，又去宝鸡参观恭拜了炎帝陵。借此机会，我又重游了五十年前军训驻地——姜城堡——原铁道兵文化学校旧址。铁道兵被裁军后，原校址现已被开发为几个居民小区和武警部队驻地。

.....

2015 年 9 月 3 日，在全国人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当天，我们全家 13 口人在我居住的小区——西岸国际花园西苑欢聚一堂，在一片和睦、吉祥、欢乐的气氛中，为我的 71 岁寿辰祝寿，并合家欢聚，拍照了一张“家和万事兴全家福”的照片，以作留念。

风雨路漫漫 暮年忆春秋



在庆祝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之际
我们全家人在西安“西岸国际花园西苑小区”满怀喜悦的心情
合照了“家和万事兴全家福”



2015年9月3日，全家人在西安庆贺我七十一周岁诞辰的宴会上

(右一：年炳强)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每个家庭都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睦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我们家族良好家风的传承、熏陶和直接影响下，几十年来，我们的家族成员一直处于团结、祥和、互尊、礼让、和谐欢欣的浓厚氛围。我们的家庭也同样如上面那张“家和万事兴全家福”照片显示的那样，团结、祥和、互尊、礼让、和谐欢欣的浓厚氛围。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由于我非常注重良好家风的培养，以防不良风气的滋生和养成，每年春节，利用孙辈们向长辈叩头拜年之际，都要向全家人发表“新年致辞”，并全程进行录音录像，教育儿女子孙们养成良好的品德和家风。因而，我们家逐渐形成了“孝敬长辈，和睦上进，勤俭持家，诚信待人”的良好家风。

儿女们处处都很注重孝道，并注重家庭大局，团结和睦，互助相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也是他们孝道本分、传承家风的体现。新胜是他们的兄长，也是他们的典范。而我们的两个儿媳妇的孝顺、和谐、礼让，更体现了她们善良、朴实无华的高尚品德。大儿媳张丽和二儿媳杨亚丽，他们都能像新胜、新平那样，尊老爱幼、顾全大局。尊老不分亲疏，爱幼不分你我。张丽性格温和乖巧、聪明伶俐，善于处人处事。亚丽心底善良，性格直爽，聪明智慧，善待亲朋邻里，吃苦耐劳，密切配合新平精心作务果树，办好油坊，使家庭经济收入日益递增。并能科学料理家务，与邻里和睦相处，从不沾染是

非。她们妯娌俩实属贤妻良母，均受到邻居的好评。我和芳云每当看到儿女、儿媳、孙辈们的孝心、孝作，和谐互助的点点滴滴，内心幸福感不由自主的油然而生。

近年，我们年逾古稀。儿女、儿媳们为了让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肌体，多次劝慰我们外出旅游，以实现他们尽孝的心愿。为了不愧对他们的意愿，在新胜和冬梅的直接关照下，2018年阳春三月，我和芳云随旅行团前赴向往已久的华东五市旅游。在南京，我们怀着悲愤，参观了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怀着敬意，瞻仰并游览了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陵园。在无锡、苏州，我们游览了著名的无锡灵山大佛寺圣地和具有悠久历史文化遗产的苏州狮子林。在浙江嘉兴，我们漫步江南水乡，观赏了带有浓厚古色古香秀美色彩的乌镇水街。在杭州，我们乘游船尽情观赏了风景如画的西湖山水，参观了景色秀丽的西湖龙井茶乡。在上海，我们乘电梯登上了四百多米高的上海国际商贸大厦观光厅，俯瞰了浦东新区繁荣的现代化风

貌；并乘巨大的豪华游轮，观赏了黄浦江入海口两岸五光十色的美丽夜景；在繁华的黄浦江畔，我们举目仰视了高达六百米的上海电视塔——东方明珠的宏伟雄姿；……。此次华东一游，使我直观感受了华东五市的地理地貌和经济腾飞景象，饱览了江南水乡的秀美风光，我内心的欣慰感油然而生。

通过各地旅游，我们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美好风光，目睹了祖国各地建设的飞速发展，深感晚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对于一个在青少年时期饱受饥寒交迫的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享受和安慰，深深感受了社会的美好、儿女的孝顺、也深深感到了人生的满足。

我是一个已有 55 年党龄的基层老党员，亲身经历了我们党成长发展的后半个里程。回顾党的历史，我感慨万千。我们党在毛主席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创建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党在摸索前进中却犯了发动和开展

“文革”的严重错误，致使我们党和国家遭受了十年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然而，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人民。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在邓小平等一系列正确理论指导下，我们党通过改革开放，开创了四十年的光辉里程。我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中国如同东方巨龙，跃然腾飞于世界前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特别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大力调整治党、治国、治军方略，全面建立惩治腐败的长效机制，使党内外腐败风得到全面的遏制，国力军力不断强大。仅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依法惩治省、部、军级以上腐败官员 430 名，党内军内国内实现了风清气正。从而，使我们党“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华大地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民富国强这样空前辉煌的盛世。

这部传记不仅是我个人的一部传记，也是一部家庭的阶段发展史，一部家族的阶段发展史。这部阶段发展史也是国家、社会阶段发展史的缩影。即是中国七十个春秋社会发展史的缩影。

它终将证明了一个铁的事实：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建立健全先进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坚持走符合中国特色的正确路线，国家才能发展、强大，社会才能飞跃进步，民众才能富裕，才能永远摆脱贫困，走幸福之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之复兴，实现我们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中国梦。这是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风雨路漫漫 暮年忆春秋

摄影选辑

风雨路漫漫 暮年忆春秋



2006年春节，我们全家人在新建的楼房客厅前欢聚一堂



2015年春节，我和芳云与已长大成人的孙辈们在一起
(后排左起：香丽、段尧、段珂、段月)

风雨路漫漫 暮年忆春秋

(分别依次为：一排左四、五、六) 和曹艺彬(后排左四)

回去五人：欣尧(前排左四)、三姐、芳云、耀亭

09年8月中旬 我们随团赴北京、天津旅游时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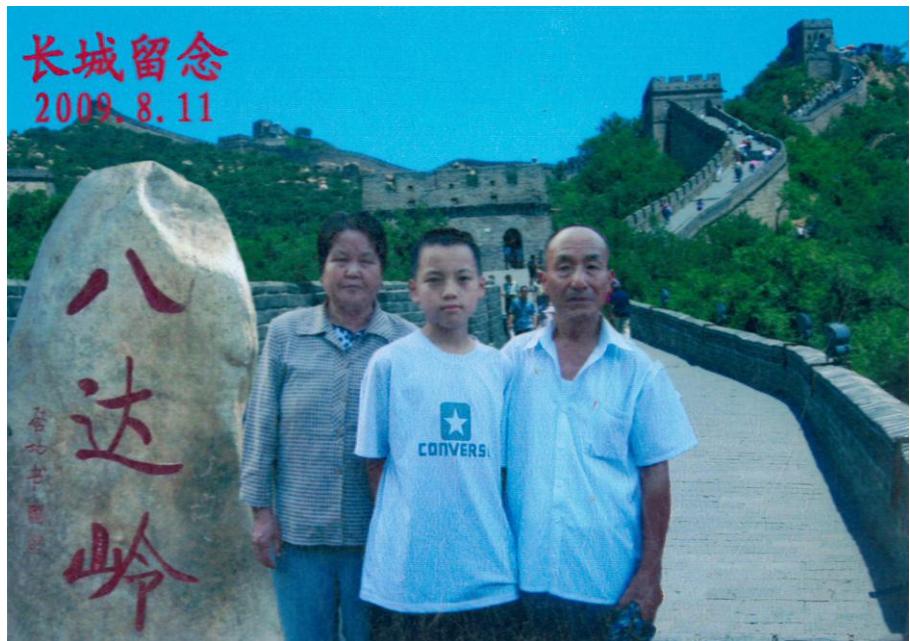
2009年8月，我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2009年8月，我（左一）和芳云（左二）、三姐（左四）、段尧（中）
曹艺彬（右一）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前合影



2009年8月，我们在宏伟壮观的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上



2009年8月，我和芳云、段尧（中）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



2007年春节，我在原窑洞院子的东边窑门前，向多次辛苦修缮，
又居住了三十年的窑洞住宅作告别留影



这是我们曾几十年朝夕出入的原窑洞住宅大门道原貌



2007年春节，新胜在原窑洞院子中间的水窖旁作深情告别留影



曾被1965年“社教运动”时错误没收，后又要回，
并经几次大的修缮的原窑洞庄基上部原貌



幼年在此读书，青年曾在此任教的历史悠久的“五圣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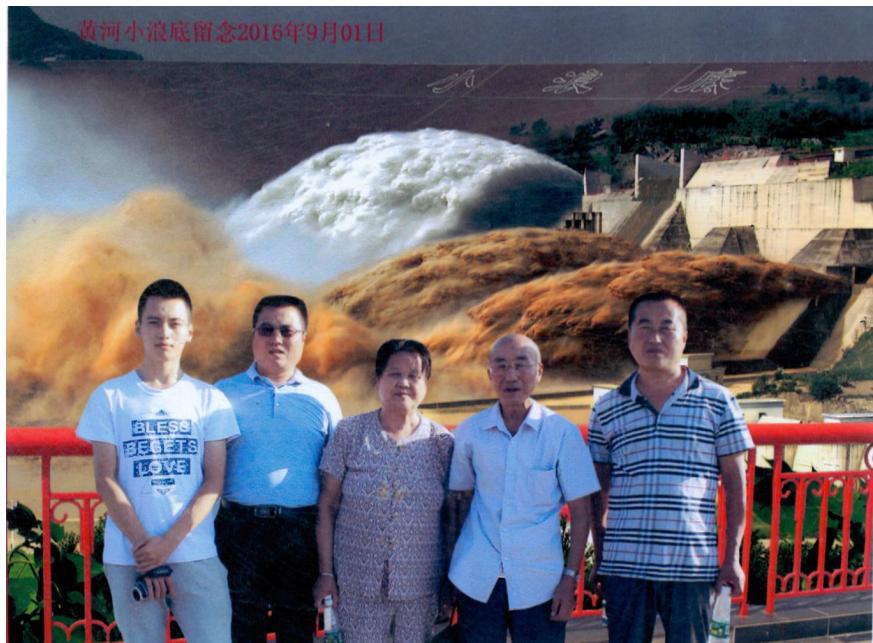
(上面“教育、革命”是我70年代在此任教时书写的)



为复耕，刚被推平的西段南村村落原窑洞庄基遗址



2015年9月，我和芳云在“西岸国际花园西苑小区”喷泉旁



2016年9月1日，我（右二）和芳云（中）、新胜（左二）、新平（右一）
专车欢送段尧（左一）赴河南工程学院上学途经著名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观光旅游



2012年6月，新胜在贵州茅台集团参观，
先后参观了酿酒二车间、五车间、新包装车间和茅台历史文化园。
这是他在贵州茅台集团公司办公大楼前留影



段新胜在广西中越边境友谊口岸留影



段新胜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口岸检查工程项目，
翻越喜马拉雅山脉途中，拍摄的珠穆朗玛峰实景



2017年6月，段新胜在珠穆朗玛峰二号大本营和守卫珠峰的藏族武警军官
(原国家级登山运动员，曾多次登顶珠峰)合影



2017年6月5日，段新胜在西藏中尼边境分界线的热索桥上留影



2017年9月，女儿段冬梅参加农发行陕西省分行在延安枣园举办的全省各支行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时，和全体与会的八十多人合影（前排右八：段冬梅）



2018年初春，新胜领我和芳云在景色秀丽、碧水荡漾的西安昆明湖上观光游览



我和芳云在宏伟、巨大而精美的西安昆明湖旁的古代龙舟模型前留影

风雨路漫漫 暮年忆春秋



2018年阳春三月，我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前留影



我和芳云在著名的无锡灵山大佛寺圣地游览



我和芳云兴致勃勃地观赏着带有浓厚古色古香秀美色彩的浙江嘉兴乌镇水街



这是我们在杭州西湖游船上抢拍风景如画的西湖山水



我们登上了宏伟巨大而装饰豪华的黄浦江游轮



我们乘着缓驶的游轮，在江面上尽情地观赏黄浦江两岸繁华优美的现代化风光

附记

这部传记是我 2004 年后季退休后在阎良开始起草的，最初只写了《前言》、《作者简介》，正文部分只写了前面两个部分。2005 年后，因多方原因而住笔未写，期间停了十年。2015 年，在西安工程大学就读的可爱的孙女段月阅读此稿后，觉得续写家史、社会发展史，对于后代人教育匪浅，故再三鼓励我，下点苦功写完，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初稿。在她要完成学业的百忙中，抽时间将初稿编辑在电脑上，并对多处文字进行了恰到好处的修改。新胜初读此稿，非常重视。认为以传记为体裁，撰写七十年来家庭、家族和社会的阶段发展史，是一项很有必要且具有深远教育意义的工程。因而，在充实完善内容及编辑印刷上，都提出了多方颇有价值的建议，使书稿逐步趋于完善。段月、段尧在文稿多次修正编辑、照片扫描选辑、合理排版上，也不厌其烦地每次进行精心操作，段珂在书稿的几次印刷上，想方设法，积

极联系，保证了书稿的印刷质量。为此，我深感欣慰。

在此，我衷心地向为书稿的完善，提出可贵意见的诸位同仁志士，表示深切的谢意。

此稿虽经多次修改、充实，且查阅了大量有关历史资料和历史文献，但终因水平和健康原因，在文笔和内容上，难免纰漏，请雅正。

段耀亭 · 2018 年 12 月于西安

全程编辑·封面设计·段月

责任编辑·段新胜

助理编辑·照片扫描·段尧

责任印刷·段珂

2018年12月·第四版印刷